

反資本主義 的心境

米塞斯 / 著 ◆ 夏道平 / 譯

自由主義名著譯叢③

反資本主義的心境

原書名 /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作者 / Ludwig von Mises

譯者 / 夏道平

責任編輯 / 彭春美

發行人 / 王榮文

出版者 /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 7 樓之 5

郵撥 / 0189456-1 電話 / (02) 392-3707

傳真號碼 / 341-0760

發行代理 / 信報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 / (02) 396-5912 傳真號碼 / 397-1913

印刷 / 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排版 / 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 1991(民80)年3月1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125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32-1087-8

目 錄

再版譯者序

校訂者的話

初版譯者序

緒 論

第一章 資本主義的特徵與詆毀資本主義者的心理因素 21

一、消費者至上 21

二、經濟改善的要求 22

三、階級社會與資本主義 24

四、失敗者的怨氣 27

五、知識分子的憤慨 30

六、美國知識分子反資本主義的偏見 32

七、白領工作者的憎恨 34

八、「堂兄弟們」的妬恨 37

九、百老匯與好萊塢的共產主義 40

第二章 普通人的社會哲學 45

一、資本主義的本身與普通人眼中的資本主義 45

二、反資本主義的陣線 50

第三章 資本主義下的著作與出版 55

一、作品的市場	55
二、書籍市場上的成功者	57
三、關於偵探小說	58
四、出版自由	60
五、學者們的偏執	62
六、社會主義的小說與劇本	67
第四章 從非經濟的觀點反對資本主義	75
一、關於幸福問題的理論	75
二、物質主義	76
三、不公道	80
四、自由與社會主義	86
五、自由與西方文明	91
第五章 反共與資本主義	97
附 錄：米塞斯的主要著作	103

再版譯者序

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這位奧國學派的第三代大師，在其一生豐富的著作中，除用德文寫的不算，他在六十歲以後居留美國親自用英文寫成的有六本，依其出版先後列舉於下：(一) *Bureaucracy* (1944)，(二) *Omnipotent Government* (1944)，(三) *Human Action* (1949: 1963)，(四)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1956)，(五) *Theory and History* (1957)，(六)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1962)。這六本書經我譯成中文的有三本。即上列(三)《人的行為》，(四)《反資本主義的心境》，(六)《經濟學的最後基礎》。這三本書，以《反資本主義的心境》這一本篇幅最少，而且最容易讀。凡有志於研讀米塞斯理論的朋友，很可以拿它作為入門的階梯。

這本書的原著，自一九五六年在美國出版以來，每隔一兩年就會重印一次。一直到現在，它的讀者還是有增無減。但是，我這個中文譯本在臺灣所遭遇的命運，卻不一樣。這，可從這本書的譯名講起。本書的中文譯名，我已改了兩次。最初的節譯本為《反資本主義的心理》。當時我將原著的 *Mentality* 一字譯作「心理」，實在欠妥。後來的全譯本，我索性把書名改為《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我改用這個譯名，是想強調資本主義遭受了無妄之災而被誣衊。真巧，我這一改，竟預兆那個譯本的本身也會遭無妄之災而被糟蹋。這件事情的經過，見之於我在《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八卷第五期（民四十七年三月一日）

刊登的一則抗議啓事。啓事的標題是「爲《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一書之被擅自刪改，向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抗議」。其全文如下：

米塞斯(L. von Mises)的近著《反資本主義的心理》(*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一書，前經本人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 News and World Report*)的摘要，譯載於《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六卷第一期至第四期(後來印有單行本)。去年秋天，本人又將該書全部譯出，書名改譯爲《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該譯稿經取得「自由中國社」的同意，由行政院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以下簡稱工業委員會)接受，作爲《經濟叢刊》之七出版，並經商務印書館及正中書局發售(當時工業委員會曾在《中央日報》刊登廣告)。不意發售數日，工業委員會經辦人告訴本人，說是該書內容強調自由民主，致受外來干涉，只好停止發售，刪節改版云云。至於如何刪節，工業委員會事前既未商得本人同意，事後也未經本人過目。刪改再印後數月，幾經本人催索，直到本年二月十一日才索得該書的刪改本(原譯本爲二十四開七十二頁，刪改本爲五十二頁)。經翻閱後，本人始知被刪去的不僅是該書的本文，而且把「譯者的話」也刪去四段；不僅刪去「譯者的話」，而且在「譯者的話」裏，擅自增加最後一段；而所增加的，又復文句不通，不知所云。

基於以上的事實經過，本人不得不向工業委員會提出一個問題，一個抗議，和一個警告：

米塞斯爲一徹底反共的經濟學家，他的作品譯本，在反共的臺灣，竟被取締而不能自由發售，本屬怪事。但近年來政府在取締書

刊方面所顯出的無知與胡鬧，已經司空見慣，不足為奇。可是，《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一書，出版者是工業委員會。工業委員會為一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所出版的書籍，為什麼會因所謂「外來干涉」而停止發售，而刪改重印？這是本人要向工業委員會提出的一個問題。

工業委員會不商得譯者的同意，擅自刪節書中本文，及「譯者的話」，尤其以不通的文句，妄自增加在「譯者的話」中，不僅侵害譯者的著作權，而且也影響譯者的寫作名譽。這是本人要向工業委員會提出的一個抗議。

現在，《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已有兩個印本。一為原譯本，一為刪改本。如果工業委員會不講是非，情願接受所謂「外來干涉」而不再發行原譯本的話，原譯本的發行權，本人特聲明保留；同時要向工業委員會提出一個警告：刪改本不得發售，也不得贈送。

這一抗議提出後，工業委員會的當事人曾託經濟部參事高叔康先生（在南京時他和我同事）向我要求諒解。於是我對抗議中所提的那個問題，也就不再追究了。可是，《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這個全譯本，當時只在書市的一角曇花一現就消失了，看到的人當然寥寥無幾。被刪改的那個本子，經我抗議後也停止發售了❶，所以米塞斯這本書的中文全譯本，可說是一直沒有上市過。現在，遠流出版公司有興趣印行米塞斯這一流派的著作，於是我首先提供這本書，同時把它的譯名回復到原著的原意，再改為《反資本主義的心境》並加一附錄列出米塞斯的主要著作，而呈現於讀者之前。當讀者在讀本書的時候，我想，他可能是會心微笑，也可能是火冒三丈。對於這樣不同的反應，我不

能說誰是誰非。但我敢說這畢竟不是叫人無動於衷的一本書。

夏道平

民國七十八年七月於台北市

註 釋

- ❶現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其前身即經濟安定委員會）出版的《自由中國之工業》裏面還刊有《經濟叢刊》的全部書目。其中第七種書目下的括號內，註明「無存書」三字。

校訂者的話

早在七年前，我就踏入「自由經濟」的思路，而漸漸相信，一個個活生生的「個人」才是經濟思考的起點和終點。在七年的摸索過程中，我雖摸到了這一思考方式，但對此種思考方式的淵源，以及這派先輩大師們的思想修養卻極度陌生，我只是就自己所接觸過的一般學理反覆思索，再以實際社會所發生的現象相互印證推敲而已。

就在夏道平先生也來到中華經濟研究院之後，於相互言談中得其教誨，才對幾位古典經濟學大師的哲理得知一、二。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這個名字，也是自那時起才知道的。但是，由於俗務纏身，一直無從獲得研讀米塞斯大作的時間，雖經夏先生屢次暗示、甚至明說，也都無所動作。

眼看一年復一年的過去，我對自由經濟理論的精髓沒有下過苦功鑽研，就在快被夏先生視為「朽木不可雕」的當兒，遠流出版公司的詹宏志和蘇拾平兩位先生竟然提議，要將夏先生早年花下心血翻譯的米塞斯三本大作，重新校訂再行出版。校訂工作理當由原譯者來作，將更為美好，然而夏先生卻以年歲已大作藉口，要求由我負責校訂工作。

事情也真巧，就在當時，香港信報財經新聞發行人林行止先生，於一九八九年六月的《信報財經月刊》上，發表一篇名為〈中國駐美大使索取米塞斯的《人的行為》——共產主義的『照妖鏡』〉一文，拜

讀之餘，不禁又對米塞斯興起莫大的興趣。米塞斯是批評社會主義最烈，而為資本主義極力辯護的，而他的代表作《人的行為》，竟受到社會主義的中國駐美大使的重視，可以想見這本書的影響力了！

在兩方面的配合下，我就接受了夏先生的要求，而開始閱讀米塞斯的三本中文譯作——《反資本主義的心境》、《經濟學的最後基礎》，以及《人的行為》。第一本屬於較通俗的作品，將反對資本主義者的心態描繪得令當事人血脈憤張，但也對被誤解了的資本主義作了一番別開生面的澄清，這是一本易於閱讀的著作。第二本是將經濟學的根基作深刻的探索，比較艱深，普通的讀者難以領悟，本人建議先讀第三本鉅作之後，再來消化它。

第三本可說是米塞斯全盤思想體系的綜合，在中文本一千多頁的篇幅裡，米塞斯鉅細靡遺的一步步闡釋自由經濟或市場機能的真義，讚歎之餘，不禁沉思這位哲人何來如此博大精深的思維。本書中所陳述的道理，許多已一一在今日印證了。但在鉅作完成當時，米塞斯卻是受到極大的排斥，是否先知們一定是不見容於當代呢？

遺憾的是，由於從事的是校訂工作，又趕時效，個人只負責閱讀譯文，而只在不通順和有質疑處提出疑問和修正，尚未能仔細咀嚼並對照原文，因此，我也僅能摸出個大概，還來不及作深一層的了解和思考。

不過，單只這種稍嫌浮面的校訂，我已覺獲益良多，尤其對我正走上的「自由經濟的思路」更加了一份信心。等到新書問世之後，當再詳讀，相信將有更多、更深的收穫。

所以，對我本人而言，雖說負責校訂，實在是從事一項「學習」的工作。感謝夏先生和遠流出版公司的朋友們給了我這個絕佳機會，

同時，也深盼讀者們和我有同樣的感覺和收穫。

吳惠林

一九九〇年元月二日

初版譯者序。

「改善人類物質生活，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相對於人口的增加，加速地累積資本。每個工人得以利用的投資額愈大，則生產與消費的物品也就愈多愈精。這就是資本主義日新月異的成就。」可是，不幸得很，「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久已被人誣讟得不成樣子。其實，「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等名詞，與「資本主義」一詞所指的只是同一件事，不過著眼點不同而已。如果我們把「市場經濟」或「自由企業」等名詞來代替「資本主義」，也許較易於獲得一般人的好感。

資本主義爲甚麼被人誣讟呢？這本書正是對這個問題從心理解析上給我們的答覆。在答覆中，同時也以簡潔而有力的詞句闡明了資本主義的主要功用——提高一般人的生活水準。

心理的解析，尤其下意識的解析，是一專門而艱深的學問。存在於下意識的東西，不是我們一般人所可意識到的（能夠意識到的，就不叫做下意識的活動了）。因此，專家們對於下意識的解析，總不免有點駭人聽聞，甚至在我們意識中引起強烈的反感。這本書精采的地方，是在心理解析方面；受人攻擊（如倫敦《經濟週報》*The Economist*）的地方，也是在心理解析方面。這一點是不足爲怪的。不過，譯者在這裏須提及的，就是：這本書不是一本分量夠重的純粹學術性的著作，讀過作者《人的行爲》（*Human Action*）那本巨著的人，再讀這本小冊子是不過癮的。這本小冊子，與其說是一篇學術論文，不如說是一篇對一般大眾

的講演。在這裏面沒有學究氣，沒有經濟學上過於專門的術語；但確有點情感的成分，因而多少有一點影響到態度的嚴謹。但是，這一缺點，自譯者看來，倒不是甚麼不可以諒解的。因為作者是親身受過納粹的壓迫，親眼看到布爾雪維克罪行的一個人。他對於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或其他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已深知其害；因而對於那些向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開步走的所謂「計劃經濟」、「管制經濟」、「統制經濟」、「福利國家」等等，也深懷憂懼。憂懼之心深重，稍稍憤激的話也就來了。這是很自然的。何況他的主旨與結論，是來自五十多年廣泛深刻的研究，有其堅強充實的基礎哩！

「要使個人在社會生活中得有充分自由，必須藉助於市場經濟的運作。憲法與人權清單②等等並不能創造自由；個人自由是競爭的經濟制度所賜予。憲法與人權清單等不過使這些自由得有保障，防止行政權的侵害而已。」這是本書的主旨與結論，這個結論不是輕易得來的，有嚴謹的理論基礎，有充分的歷史根據。

書中有一二處很不客氣地批評到東方國家和亞非國家。作為東方人亞洲人的我們，也許在情感上很不高興。所幸我們中國有句很好的流行的格言，「良藥苦口利於病」。別生氣，把頭腦冷靜下來想一想，這本書所講的，對於我們而言，是不是一服良藥？如果是的，儘管苦口，也得吞下去。

作者米塞斯教授(Prof. Ludwig von Mises)，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經濟學者；對於學經濟學的人，是用不著介紹的。可是，這本書是為一般讀者寫的，這個譯本也是為一般讀者譯的。因此，似乎應該要簡單介紹一下這位作者。

米塞斯博士，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九日生於奧大利的勒謨堡(Lem-

berg, 現已成為蘇俄領土, 改名勒服夫 Lvov), 現年六十六歲。一九〇六年畢業於維也納大學, 得法學博士學位。一九一三至一九四〇年之間, 他在母校維也納大學和日內瓦國際學院任教。一九四〇年他到了美國, 一直留到現在。他曾經被英國、德國、荷蘭、法國、意大利、墨西哥、秘魯等國著名大學和其他學術機構邀請, 前往講學。他的十多本著作, 幾乎每一本都有好幾國文字的譯本。現在, 他還在紐約大學工商管理研究院擔任客座教授。

這本書原名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一九五六年十月由美國 D. Nostrand Company Inc. 出版。在出版的前夕, 《美國新聞與世界導報》(*U. S. News and World Report*) 取得了摘要發表的權利, 儘先以 “What's Behind the War on Business” 為題, 於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摘要發表。那篇摘要, 譯者曾經譯過。譯稿以「反資本主義的心理」為題, 由《自由中國》半月刊(第十六卷一期至四期) 連續發表。現在, 這個全文的譯本, 得到自由中國半月刊社的同意另行出版, 譯者特在這裏附表謝意。

夏道平

民國四十六年於臺北

註 釋

① 原為《被誣衊了的資本主義》譯者的話。

② Bill of Rights 一詞, 舊譯「人權法案」或「權利法案」。「人權清單」這個譯

名，是張佛泉教授首創的。張先生所以要改譯這個名稱，是在表明基本人權在一國全法律系統中所佔的地位。這一點很關重要。請參考張著《自由與人權》（亞洲出版社出版，臺北東方書店經售）凡例二及第四章第三節、第六章第一節。

緒論

自從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代替了從前的經濟制度以後，人口倍增，一般生活水準也空前地提高了。

今天，凡是對於自由企業與個人創業精神所加的障礙比較少的國家，也就是比較繁榮的國家。美國人比別國人生活得好些，就是因為美國政府之採取經濟干涉政策，比別國政府要遲些。

儘管如此，今天還有許多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在情感上厭惡資本主義。照他們看來，資本主義這個怪物只會帶來罪惡與苦難。在工業革命以前，大家曾享受過康樂的日子；現在資本主義之下，大多數的人被一些粗俗的傢伙剝削得窮困不堪，而那些傢伙只是爲了賺錢。他們並不生產好的東西和真正有用的東西，只是找最賺錢的東西來生產。他們的身心，靡爛於煙酒與色情之中。資本主義的意理(ideology)，表現於腐化而下流的著作、滑稽表演、脫衣舞、好萊塢電影，以及偵探小說。

這種偏見很明顯地表現於「資本主義的」這一形容詞的使用。他們總是用它來形容許多可惡的事體，從不把它用來形容大家所喜歡的東西。資本主義哪會有好的結果哩！有價值的東西與資本主義無關，壞的事物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

這篇論文就是要對於這種反資本主義的偏見加以分析，並找出它的根源和後果。

第 1 章

資本主義的特徵與詆毀資本主義者的心理因素

一、消費者至上

現代資本主義的特徵，是在為大眾的消費而大量生產。大量生產的結果，使一般生活水準繼續改善，使許多人的財富不斷增加。資本主義更把平民從無產階級提升到資產階級。

在資本主義的市場上，普通的消費者握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們的購買或拒絕購買，對於應該生產甚麼、品質應該怎樣、數量應該多少，都會作最後的決定。那些專門迎合富人的喜好而製造奢侈品的廠商，在廣大的市場經濟中，只是一個配角；他們的生意不會做很大。大規模的工商業總是直接或間接為大眾服務的。

平民大眾在這方面的抬頭，是工業革命所引起的一個社會大變動。

那些向來屬於低級社會的奴隸、農奴、窮民、叫化子等等，現在都成了購買者，工商界要向他們兜攬生意。他們成了「無不是的」買主；他們能夠使窮的賣主富起來，也能夠使富的賣主窮下去。

在市場經濟（假定沒有被政府和政客們妄加破壞的話）的結構中，不會有特權的貴族騎在平民的背上榨取他們；不會一方面鐘鳴鼎食，一方面冷炙殘羹。

在利潤制度下成功的人，是那些能夠以價廉物美的東西滿足大眾慾望的人。

只有為消費者服務，才是發財之道。

資本家投資，如果沒有看準大眾的需要，他就會很快賠掉他的本錢。消費者在市場上用一分錢，就是投一次票；在每天的全民投票中，消費者就決定哪些人應該保有和經營工廠、商店與農場。生產手段之能否掌握，以消費者的認可或撤消認可以為斷。就這一社會機能來看，消費者至上。

現代觀念中的自由，其意義就是如此。每個成年人都可自由地按照自己的計劃來生活，不致在警察監督之下被迫地遵照政府的甚麼計劃。個人自由之有限制，不是來自別人的迫害或迫害的威脅，而是來自自己身體上的生理組織，以及自然界生產因素的稀少性。人，永久不能違背自然法則去安排他的命運。

確認這些事實，並不等於以絕對標準或玄學觀念來為個人自由找理論的根據；也不是對於流行中的左派或右派極權主義的理論加以任何評判或辯駁。極權主義者認為平民羣衆都是愚昧的，不懂得自己「真正的」需要和利益，所以必須有個扮演「監護者」的政府，否則他們會傷害他們自己；這種監護的責任就由一些所謂「超人」來擔當。

二、經濟改善的要求

在資本主義時代，一個普通人也能享受以前最富的人所享受不到的東西。像汽車、電視機、冰箱這一類的東西，雖然並不能經常叫人快樂，但在剛剛得到這些東西的時候，他是會感覺愉快的。某些慾望滿足了，另一些慾望又發生，這就是人性。

美國人的生活標準是全世界最高的；從那些非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看來，美國人的平均生活，可望而不可及。這種事實，少數的美國人已充分了解。

大多數的人總是輕視已經享有與易於獲得的事物，而渴求那些難於得到的東西。慨歎人心不足，只是沒出息的表現。不知足的慾望，正是經濟改善的動力。滿足於既得或易得的事物，對於進一步改善物質環境毫不動心，這並不是美德。這種生活態度，與其說是有理智的人類的行爲，無寧說是禽獸的習性。人類最明顯的特質，就是不斷地努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可是，這些努力一定要與目的相符。換句話講，這些努力必須適於達成所追求的目標。我們這個時代的人，大多數所犯的錯誤，並不在於渴求更豐富的財貨，而在於用錯了方法。他們被一些捏造的意理迷誤了。他們所採用的政策，與他們自己所了解的真正重要利益相衝突。他們短視，看不清這些行爲所不可避免的終極結果。那些結果，必然地是大家貧困，是社會合作（在分工原則下的合作）的解體，是野蠻狀態的回復。

改善人類物質生活，只有一個方法：就是相對於人口的增加，加速地累積資本。每個工人得以利用的投資額愈大，則生產與消費的財貨也就愈多愈精。

這就是資本主義（也即是被人咒罵的利潤制度）日新月異的成就。可是，今天大多數的政府和政黨，反而急於想毀壞這個制度。

他們爲甚麼要厭惡資本主義呢？他們在生活方面正享受現代資本主義的成果，但同時卻把羨慕的眼光投射到過去的「黃金時代」和現在的蘇俄，爲甚麼？

三、階級社會與資本主義

在答覆這個問題以前，我們必須把資本主義社會不同於階級社會的地方弄得清清楚楚。

許多人常常把市場經濟的企業家、資本家，與階級社會的貴族相提並稱，認為他們是一丘之貉。這一類比的根據，是因為企業家、資本家與貴族們都是比較富有的人。但是，這樣的類比是錯誤的。他們沒有看出貴族之富有與資本家之富有兩者之間有何根本的不同。

貴族的財富，不是一種市場現象；它不是來自對於消費者有何供應，它也不是因為消費者羣有何行動而受虧損。它來自掠奪，或來自掠奪者的賜與。這種財富，可能由於賜與者的收回而失掉，也可能被另一個掠奪者用強力搶去，也可能因揮霍無度而消失。封建領主並不為消費者服務，也即是不與一般平民直接發生接觸，因此他反而可以免招庶民的怨尤。

企業家與資本家，就與貴族們不同。他們之有財富，是得力於消費者的光顧。如果他們在市場上遇著勁敵，拿出物更廉、質更美的東西來競爭，他們很快就會失掉所有。

在階級社會中，人們被分成許許多多世襲的階級。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地位和權利。有的由法律賦予特權，有的在法律上無行為能力。這種社會的形成，有其歷史的原因。關於這些歷史原因，這篇論文不擬加以敘述。在這裏，我們所應該指出的，只是一件事實，即：封建制度與資本主義是不相容的。由於封建制度的消滅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原則的建立，人與人之間的障壁才得以撤除，使得大家都可享受私有生產手段與私營企業所可獲致的福利。

在一個階級社會中，個人的社會地位，終其一生是確定不移的。他一生下來就屬於某個階級，社會地位由法律與習慣所硬性規定，同時法律與習慣也規定了他那個階級中每個分子的權利與義務。至於能從本階級升到較高階級，或降到較低階級的個人，都是例外的極少的幸運或惡運者。在通常的情形下，某一階級中的個人，只能隨全體分子的情況變動而變動。個人不是國家的一個公民；他是某個階級的一分子，因而他只是間接地與國家結合。他與本國的另一階級的人發生接觸時，思想與情感絲毫不起融洽作用，他只感覺到彼此隔著一條鴻溝。這種情形表現在語言方面，也表現在服裝方面。在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政體下，歐洲的貴族們都喜歡說法國語，第三階級說本國語，較低級的市民和農民們則老是講方言、土話、以及知識分子聽不懂的暗語。服裝，也因階級的高低而不相同。遇見一個陌生的人，一望就可看出他的社會地位。

把過去頌揚為黃金時代的人們，每每非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們認為，這一原則破壞了階級的特權與尊嚴，其結果是把社會「原子化了」(atomized)，使「有機的」階層解體為游離不定的羣衆。現在，大家各不上下。物質主義代替了過去時代的高貴典型。金錢就是國王。卑賤的人富有，高尚的人兩手空空。

這種非難所隱含的意念，是說在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政體下，貴族們都是由於德行而出類拔萃的，他們地位崇高與收入豐富，得力於他們的道德與文化水準的優越。這種荒誕的想法，沒有駁斥的必要。撇開任何的價值判斷不談，歷史家不得不大書特書：歐洲各國的高級貴族，都是十六七世紀宗教戰爭與王位戰爭當中，那些見風轉舵、趨炎附勢的軍人及倖臣輩的子子孫孫。

資本主義的兩派敵人——保守的與「進步的」——對於舊的規範，彼此估價不同，但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規範則一致攻擊。自他們看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名利雙收的，並不是那些值得他們敬重的人，而是一些無聊的輕薄的傢伙。這兩派人都妄想以較好的「分配」方法，去代替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公平的方法。

從永恆的價值標準來看，誰也不會認為：在一個毫無阻礙的資本主義之下，凡是應該被選擇的人，就是生活最好的人。資本主義的市場民主，並不是按照人們天賦的美德或道德修養而給予報酬；資本主義之所以使人或多或少地享有財富，不是從「絕對的」正義來評量他的貢獻，而是由大多數人以其個人慾望的滿足作標準所定的評價。市場的民主制度，其意義就是如此。消費者至上，也即是說，主權在於消費者。他們所需要的，是慾望的滿足。

無數的人喜歡喝「賓卡賓卡」(Pinkapinka 為舉世歡迎的賓卡賓卡公司所提供的一種飲料)；無數的人喜歡偵探故事、神秘的影片、小型報紙、鬥牛、拳賽、威士忌、煙捲、口香糖。所以，凡是能夠以最好最便宜的方法供給這些東西，以滿足大眾需要的人，就會成為富翁。所以，在市場經濟當中所應計較的，不是理論上的價值判斷，而是實際上大家的購買與不購買。

在市場制度之下，有的人深感不平。對於這種人，我可提出一個忠告：如果你想發財，那麼，就得想法拿出價廉而又為人所喜歡的東西來滿足大眾，例如，調製一種比賓卡賓卡更好的飲料。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你有權向每個百萬富翁挑戰。在一個未經政府干擾的市場當中，如果你不能夠勝過巧克力大王、電影明星、拳賽選手，那就是你自己不行。

但是，如果你寧可吟風弄月或研究哲學以求快意，而不屑於去開服裝店或做個拳擊專家而致富，這是你的自由。這樣，你所能夠賺得的錢，當然不能像那些為大眾服務的人所賺得的錢一樣多。因為這是市場民主經濟的法則。在市場的民主經濟中，誰能夠滿足多數人，誰就可以贏得多數的選票——金元。所以就賺錢這件事講，電影明星當然勝過哲學家，賓卡賓卡的製造者當然勝過交響樂的作曲家。

我們必須認清，社會提供獎品讓大家都有競爭的機會，這是一個社會制度。但在這個競爭獎品的制度下，許多人因天賦的障礙，妨害了他的成功。有的人一生下來就是病夫，有的人到了後半生就能力減退。這都不是競獎制度所能改變的。生理上的裝備，嚴格地限制了一個人所能工作的範圍。有能力可以自由思想的人與不能自由思想的人，其差別是無法計量的。

四、失敗者的怨氣

現在我們試看人們為甚麼厭惡資本主義。

在一個以階級為基礎的社會裏面，倒霉的人可以把環境歸咎於命運。他之所以為奴隸，是因為有一種決定一切的超人力量，指派了他的階級。他自己無可如何，因而他沒有理由要以身世卑賤為可恥。他的妻子也不能指責他，如果他的妻子真的問他：「你為甚麼不是一個公爵呢？你若是公爵，我就是公爵夫人了。」他一定會答覆：「假如我一生下來就是公爵的兒子，我也不會和你這個奴隸的女兒結婚，而要做另一個公爵小姐的丈夫了。你不能做公爵夫人，完全是你自己的過錯；你為甚麼不好好地選擇你的父母呢？」

在資本主義的制度下，事情就全然不同了。每個人的生活地位都

靠自己來決定。凡是有野心而未完全實現的人，都會很清楚的知道是他自己錯過了若干機會，或是由於不合時宜而被冷落。如果他的妻子埋怨他：「你爲甚麼只賺八十元的週薪呢？假若你像同事保羅那麼能幹的話，你應該昇爲領班，而我也可以過較好的生活。」這時，他就會覺得不如人而感到慚愧。

大多數人批評資本主義太冷酷，這是由於在資本主義之下，每個人按照他給別人的貢獻而取得報酬。這個原則的權威，對於個人的缺陷毫無寬假。每個人都知道，在他自己失敗了的地方，有的人成功了。每個人也都知道，在他所妬羨的人當中，有些原來與他立於同等地位，由於努力而爬起來的。他想起這些，自然心有不甘；最壞的，他還知道別人也清楚這些事情，於是他更覺難過。從妻子兒女的眼光中，他領會到一種無言的責難：「爲甚麼你不能更能幹一點呢？」他經常看到大家都恭維那些成功的人，而以冷眼或憐惜的態度對他。

資本主義使每個人有發展的機會，但是，成功的只有少數。這一事實，使得許多人感覺不快。就大多數講，一個人努力的收穫，無論它是甚麼，若與他的野心所希望的相比較，總是微乎其微。另一方面，他又經常看到別人成功的地方，正是自己失敗的地方。由於下意識裏自卑感的滋長，於是對於那些勝過他的人，他就心懷憎恨了。此所以走江湖的人嫉妬有恆業的人；工廠裏的工人嫉妬領班；公司管理員嫉妬副經理；副經理嫉妬總經理；擁有三十萬元的人嫉妬百萬富翁……每個人自我信賴心與道德平衡，無形中都被另外的少數人傷害了。那些少數人，是以事業的成功來炫耀他們的能力強、才幹高。

德國有一大羣著作家，對於「西方」啓蒙運動的若干觀念和唯理主義(rational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自由放任等哲學，以及來

自這些思想的若干政策，一概採取強烈的反對態度。這一羣著作家，是由摩梭爾(Justus Moser)領導的。新的學說當中，最使摩梭爾憤怒的，是主張文武官吏的陞遷，須以個人的功績與能力為標準，而不依據在職者的門閥、血統、年齡和服務的時間。摩梭爾以為，在一個「成功專靠個人功績」的社會中，有許多人是很難堪的。因為人性就是這樣：每個人都會把自己估價過高。如果一個人的身份高低，不是決定於他自己的天生才幹，而是被另外的一些因素決定，那麼，那些停留在低級地位而爬不上去的人們，纔可甘心忍受，而也無損於他們的自信與自尊。但如果專靠功績來決定的話，情形就不同了。失敗的人就會自覺羞辱，由自覺羞辱而生怨恨，對於所有勝過他的人都懷怨恨。①

以價格與市場為主體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以個人的作為決定他的成敗。這種功績原則，因為摩梭爾的偏見所反對，但他對於那些從市場制度中失敗下來的人所作的心理觀察，確是很對的。

為著自安自慰並為自己辯護，這樣失敗的人總要找一個替罪的羔羊。他要使自己相信，失敗的原因不在自己。他覺得，他的聰明才智與努力至少不會比那些成功的人差。不幸，這個萬惡的社會制度不獎勵最可敬佩的人，而是把光榮給那些非法橫行的惡棍、騙子、剝削者、魯莽漢。他之所以失敗，是由於他的誠實。他不屑於採用卑鄙污濁的手段，而那些手段正是成功者所賴以成功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個人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一是富而不仁，一是仁而不富。他，他自己，謝謝上帝，作了正確的選擇，沒有走上富而不仁的途徑！

這就是生活在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為自己的失敗找尋替罪羔羊的心理狀態。其實，資本主義社會是按照各人對於大家福利的貢獻而分別待遇的，因此每個人都是他自己命運的創造者。在這種社會裏，凡

是野心沒有充分滿足的人，總不免心懷憤慨，因而對於那些比較成功的人也就怨恨了。於是，愚蠢一點的，就以惡言惡語任意誹謗，發洩肚皮裏的怨氣。有點修養而慣於矯飾的，則把他們的怨氣昇華為一種哲學——反資本主義的哲學。他們想以這種哲學來抑制自己內心深處一種聽不見的聲音，那個聲音，時時刻刻在告訴他們：失敗，完全是自己的過失。

他們那麼狂熱地為反資本主義的立場而辯護，正是由於他們的意識界正在進行自我交戰。

生活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裏面，野心受了挫折而感受到的苦痛，是不同尋常的。其所以如此，並不是由於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一事實，而是由於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社會中，人與人之間才智的差異、意志力的強弱、勤勉程度的不同，都會毫無掩蓋地暴露出來。由於這種無情的暴露，那些受了挫折而又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就得為他的心靈找個避難所，於是形成了一些空想，想出一個「完善的」世界來。在那個「完善的」世界裏，大家所接受的待遇，是以各人的所謂「真實價值」為標準。

五、知識分子的憤慨

在通常情形下，一般平民沒有機會和那些比他更成功的人經常在一起。平民總是在平民圈子內打轉，他不會從社交中遇到他職務上的頭兒。他不會從親身的經驗中，看出一個企業家或一個管理員有何不同的才能可以為消費者服務而獲致成功。因此，他所嫉妬和憤恨的，不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而是模模糊糊的一些抽象的東西，像「管理」、「資本」、「華爾街」等等。怨恨這些抽象的東西，與怨恨一

個天天見面的人，在感情上是不一樣的，前一場合不會像後一場合那麼激烈。

另外有些人，由於職業的特殊性或家庭親戚關係，經常要與那些比他們更有成就的人親身接觸；而後者的成就，照前者想來，應該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因此，這般人的怨恨，就不像一般平民那樣以抽象的東西為對象，而是以他們日常接觸的人為對象。所以他們的感情更為激切。他們咒罵資本主義，因為資本主義把他們應該享有的地位給了別人。

這就是普通稱為知識分子的情形。我們以醫生為例來講吧。每個醫生從日常工作與經驗中都已認知這個事實，即醫界是一階級社會，所有的分等都是以功績為標準。那些技術造詣比他好而地位比他高的人，大都是他當年在醫科學校的同班同學，他們曾經同他在一塊做過住院醫生，他們曾經同他一起出席過醫生協會。他經常在病人牀邊碰到他們，也經常在社交場合碰到他們。他們當中有些是他的朋友，有些是他的親戚。他們都對他很客氣，也把他當作同僚來稱呼。但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則高高在他之上，而收入也比他的多得多。他們勝過他而屬於另一個階層了。當他這樣一想的時候，他就感到羞辱。但是他又必須隨時隨地提防自己，以免這份怨憤和嫉妬的情感被人窺出，更使人瞧他不起。他必須掩蓋這份情感，另找一個替代的目標來發洩怨氣。於是社會經濟制度就成了他攻擊的對象了：這個萬惡的資本主義！其實就他的能力、他的才智、他的努力與造詣來講，這個不公平的制度，已經給他應得的報酬了。

同樣地，在律師與教員、藝術家與演員、作家與記者、建築師與科學家、工程師與藥劑師當中，也有許多人有這種心理狀態。他們眼

看著以前的同事、同學和親密朋友騰達起來，也覺得自己受了委屈；同時，由於同行同事等等關係應有的情誼遮蓋住嫉妬的實情，更加深了他們內心的憤懣。

在某些知識分子的心目中，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就體現在那些熟人的身上。那些人的成功是他所憎惡的，他們把自己的委屈都歸咎於那些人。那些人既是資本主義的化身，所以資本主義也為他們所厭惡。要了解知識分子為甚麼都對資本主義大肆攻擊，我們必須認清這一個要點。

六、美國知識分子反資本主義的偏見

知識分子之反資本主義，這一現象不只見之於一個國家或少數國家，但在美國則比在歐洲各國更為普遍、更為厲害。為解釋這個頗為令人驚奇的現象，我們必須從「社交界」(society)或法文的 le monde 說起。

在歐洲，「社交界」包括各方面活躍的有名人物。政治家與國會的領袖、行政機關各部門的首長、各報刊的出版者與編輯、聞名的作家、科學家、藝術家、演員、音樂家、工程師、律師與醫生，再加上工商界鉅子、貴族的後裔，這般人就形成所謂上流社會。他們彼此之間常常接觸，宴會、茶會、舞會、展覽會、演劇，都是他們碰頭的機會。他們常常到同一的餐館、旅社和其他聚會場所。

當他們聚在一塊的時候，他們都喜歡談論關於知識方面的事情。這種社交風氣，是從文藝復興時代的意大利開始的，接著盛行於巴黎的沙龍(salon)，後來西歐與中歐所有重要城市的「社交界」，也都羣起倣效。

凡是新的觀念與新的意理，在尚未影響到全社會的時候，都在這些聚會中經過了若干次的議論。研究十九世紀歐洲美術史與文學史的人，如不從當時的「社交界」著手，是難於獲得要領的。因為，當時的「社交界」對於美術與文學等方面的人物，曾發生過抑揚褒貶的作用。

歐洲這樣的社交界，並不是緊閉大門的，凡在任何方面出色當行的人物，都可以加入。闊人與富人的加入，當然更容易一點，但在這裏面，富與貴並不能決定某個人的地位與聲望；能夠在這裏享有聲望的人，是由於他個人有某些卓越之處。巴黎的沙龍泰斗，並不是百萬富翁，而是法蘭西研究院(Academie Francaise)的分子。知識分子既佔領導地位，其他的人至少也得附庸風雅，對於知識方面的事物，表示很有興趣的樣子。

歐洲這樣的社交界，對於美國人是陌生的。美國所謂的「社交界」幾乎只是包括最富有的家庭。工商界鉅子，與卓越的著作家、藝作家、科學家之間沒有社交上的接觸。有些人是輿論的倡導者，有些人是某些觀念的先進，而這些觀念將會影響國家的前途；可是這般人與那些在社會名人錄上有姓名的人，也沒有甚麼社交上的來往。大多數社交界的名人，對於讀書沒有興趣，對於觀念上的問題，更沒有興趣。當他們聚在一塊而不玩紙牌的時候，就是議論人物，或者以娛樂的節目做話題，很少很少涉及文化方面的事體。這些人當中縱然有少數人對於讀書不很厭惡，但他們也不想結識著作家、科學家和藝術家。因此，在社交界與知識分子之間，橫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這種情況的形成，我們不難從歷史上求得解釋。但這樣的解釋並不能改變實際的情況。「社交界」既蔑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反應就

是憤恨。

美國的著作家或科學家，慣於把工商界的富人看作粗俗的市儈，教授先生每每瞧不起那些熱心於學校球隊而不熱心於學術成就的學生。如果他知道競技的訓練者比哲學教授賺得的薪水更多，他便覺得是個侮辱。有些工商界的人只重視研究工作的金錢價值，這些工商界人士，也為一般做研究工作、發明過新的生產方法的人所痛恨。

美國有很多的物理學家同情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由於他們不懂得經濟學而又常常聽到大學內某些經濟學的教員也在反對利潤制度，這就很難希望他們抱持其他的態度了。

一個國家，如果有一羣人把自己圈起來，與其他的人羣隔絕，特別是與知識界的領袖們隔絕，像美國「社交界」那樣的作風，則他們必然會成為圈子外的衆矢之的。美國那些有錢的人在社交上的排他主義，正是自己孤立自己，而且激怒羣情，以致知識分子大都傾向於反資本主義。

七、白領工作者的憎恨

白領工作者對於資本主義的憎恨，除掉一般性的以外，由於工作關係，還有其特殊的憎恨。

他在經理部門，坐在寫字檯的後面，經常在記錄業務上的語言與數字。對於這種工作，他每每高估了它的重要性。他也像頭兒一樣，經常審閱其他同事們提出的報告，並且也直接或用電話與他人商談。於是很自負，他以為 he 自己是屬於企業管理部門的樞機，乃把自己的任務與頭兒的相提並論。同時，作為一個「勞心者」，他又瞧不起那些指掌胼胝而骯髒的手藝工人。可是這些手藝工人賺得更多的報酬，

也更被人重視。這種現象，使得他更為憤怒。他想，資本主義不按照他「智力」工作的「真實」價值給以報酬，而偏要優待那些簡單的賤工。可恨！

以「勞心」與「勞力」來分高低貴賤，這是個陳腐的觀念。由於這一觀念作怪，白領工作者就看不清實際情形，以致盲於估價。他不知道，他自己的那種附屬性的書記工作，只要簡單的訓練就會做得好；他不知道，他所嫉妬的那些動手的工作，需要懂得怎樣處理現代工業中複雜而微妙的機械，必須受過高度技術訓練的人纔能勝任。白領工作者之不了解這種實情，正表明他缺乏識見與理解力。

另一方面，書記工作者也和專門職業者（醫師、律師）一樣，每天要與一些比他更成功的人們接觸而使他苦惱。他親眼看見有些同事是從自己同樣的地位抖起來的，而他自己則落在人後。昨天，保羅和他是同一個等級；今天，保羅陞遷了，也顯得比他重要。他一想，在任何方面，保羅都不如他，於是乎他的結論就是：保羅的抖起來，靠的是卑鄙手段；而這種手段，只有在大家所咒罵的不公平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纔能夠行之有效。

書記人員的妄自尊大，把他自己的那種助手工作，與他們頭兒的工作相提並論，自以為是中樞活動的一部分，這種心理的典型，我們在列寧的一篇論文〈論述「生產與分配的控制」〉中，可以看得出。

列寧本人和他的那羣造反者，對於市場經濟的運作，一點也不了解，同時，他們也不求了解。他們所知道的資本主義，只是馬克斯所形容的萬惡中最惡的東西。他們是職業革命家，籌黨費是他們唯一的賺錢方法。黨費雖也有自願捐輸或應募的，但大部分是來自強迫的勒索或沒收。一九一七年以前，這些革命同志們，有些亡命在西歐和中

歐，那時，他們常常在公司裏面做點書記一類的助手工作。填表、寫信、登記帳冊、整理文件，這一類的經驗，就是他們的經驗。列寧對於企業家的活動，僅僅是根據他的同志們這點經驗來認識的。

列寧很正確地把企業家的工作，與工程師、農業家等等技術人員的工作分辨清楚。技術方面的專家們，大都是執行命令的。他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服從資本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就要服從「武裝的工人」。資本家與企業家，彼此的功用不同；不同的地方，照列寧的想法，前者控制生產與分配，後者控制勞工與產品。其實，資本家與企業家的任務，都在於以最好的方法去利用生產要素以滿足消費者的慾望——即是說，他們是在決定生產些甚麼，量多少，質又如何。

但是，這不是列寧所說的「控制」的意思。因為列寧是馬克斯的信徒，他不會知道在任何社會制度下，生產活動所必定遭遇的幾個問題：生產要素不可避免的稀少性；未來的情形不確定，因之生產難於準備；以及如何從許多技術性的方法中挑選最好的方法，而被挑選的方法，不僅要能夠達成既定的目的，而且也要對於其他目的的達成極少妨礙——即是說，利用這種方法，可使生產成本減至最低的程度。

關於這一類的問題，在列寧奉之為聖經的馬克斯與恩格斯的著作中，一點影子也找不著。列寧所有的工商業知識，都是那些在公司寫字間裏作過事的同志們所講的那一套。他們是把工商業看作一大堆繕寫、記錄和計算的工作。所以列寧說，「計算控制」是組織社會與改造社會的主要工作。但是，他又繼續說，「計算與控制」已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簡化到了極點……只要能讀、能寫，並懂得算術四則的人，都可勝任這種簡單工作。」②

這就是書記人員所特有的看法，也即是他們憎恨資本主義的一個

根由。

八、「堂兄弟們」的妬恨

在一個不受外力干擾的市場裏面，誰的生產效率最高，生產要素就轉到他的手中。這個動態是永不停止的。個人或公司，一旦努力鬆懈，不能以最好的方法去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則以前慘澹經營所累積的財富，馬上就開始消散。

財富的這樣消散，有的是在企業家本人的晚年即已開始。因為年老力衰，不能繼續應付市場的無窮變化；但是，更常見的則是由於繼承人的不振作，以致敗掉了先人的遺產。

如果不振作的後嗣，還能不失為有錢人的話，那就是由於反資本主義趨勢下的某些制度和政治措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裏面，要保持既得的財富只有一法，就是天天與人競爭以增加財富。因此有些不振作的後嗣，從市場上退出來。他們只好購儲公債，在政府的庇護下逃避市場淘汰的危險④。

有些家庭，連續幾代都有卓越的企業人才，兒輩、孫輩、乃至曾孫輩，都有一兩個能與祖先媲美，甚至超過祖先的人物。在這樣的家庭裏面，先人遺傳下來的財富不僅不致消散，而且日益增多。

自然，這樣的情形是不常見的。它們之所以引人注意，不僅是由於不常見，而且也由於那些增殖遺產的人，享受了雙重榮譽，既為祖先增光，又為本人生色。這種「世家子弟」——有些不明瞭階級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之別的人，這樣稱呼他們——在其個人修養方面，大都把優雅的風度與生意人的勤勉和精幹相結合。這種人，有的是全國最富的企業家，有的是全世界最富的企業家。

這少數的所謂「世家」，與現代反資本主義的宣傳，有很重大的關係。爲說明這一點，我們必須把這類家庭的內情，詳加檢察一番。

在這類幸福的家庭中，其子孫也不會個個有大企業家的才幹。有這種才幹的，一代當中通常只有一人或兩人。爲著保持與增殖家產，必須由這一兩個人負起經營事業的責任，其餘的都是分享利益的份子。這種關係的安排，各國有各國的法律規定，但其結果總是一律的。即是在這種家庭當中，家庭份子分成兩類，一類是經營事業的，一類是不管事業的。

在通常情形，第二類的人都是與第一類的人有親密關係的。我們把第一類的人叫做「頭兒」。第二類的人包括頭兒的兄弟、堂兄弟、姪子，有時還包括姊妹、孀居的嫂娣、堂姊妹、姪女等等。我們把這第二類的人統統稱爲「堂兄弟們」。

這些「堂兄弟們」從公司或商店裏拿錢用。但是他們對於工商業是外行，一個企業家所面對的是些甚麼問題，他們一點也不知道。他們在那些供給膳宿的中學和大學裏面成長起來，而那些學校大都充滿了鄙棄賺錢的氣氛。他們當中，有些人把時間花在夜總會、賭博場、或酒色場所。有些人則附庸風雅，很膚淺地畫幾筆畫，寫幾行詩，或耍幾下其他的「藝術」。所以「堂兄弟們」當中，大多數是些遊手好閒而無用的人。

但是，也有例外。而這些例外的「堂兄弟們」，在某些方面的光榮成就，足以抵消那些花花公子的聲名狼籍而有餘。許多卓越的著作家、學者、政治家，就是「堂兄弟們」當中的例外人物。這些人因爲不愁生計，不必幹那些賺錢的工作，所以他們在思想方面成了若干新觀念的倡導人。此外還有些「堂兄弟們」，因爲自己的智慧較差，不會有何

創見，但他們對於藝術工作者很慷慨地給予物質與精神上的援助和鼓勵，以致產生了偉大的藝術家。這一類的「堂兄弟們」，對於社會也是有貢獻的，因為他們是藝術家的保護人(the maecenas of artists)。

英國在思想與政治方面的革新，常常得力於這般有錢人的幫助，這是歷史家所重視的事實。法國十九世紀的大著作家與名藝術家，也是在「社交界」(le monde)經常得到物質與精神的鼓勵。

這裏，我們並不是要責備花花公子們的罪惡，也不是要宣揚另一些富人們的優點。我們要指出，在「堂兄弟們」當中另有一羣特別人物，他們接受了一些摧毀市場經濟的理論，並且為這些理論的傳播推波助瀾。

「堂兄弟們」與他們頭兒的經濟關係，以及與家庭公司或商號的經濟關係，大都是遵照他們父親或祖父的遺囑安排的，也有的是依照「堂兄弟們」自己簽了字的協定來安排的。但是，有些「堂兄弟們」總覺得這種安排——無論它屬於哪一種——都是損害他們的。他們總以為自己所得的太少，而頭兒所得的太多。他們對於工商業與市場，毫無知識，只是相信馬克斯所講的：資本會自動生息。他們不懂得家庭裏那些經營事業的分子，為甚麼應該比他們自己多賺些錢。資產負債表與損益計算書的意義，他們不了解。他們總疑心頭兒的所作所為是在欺騙他們，剝削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於是，家庭內部就不斷地發生爭執。

在這種情形下，頭兒們的憤怒是不足為怪的。他們克服了政府與工會加在大規模工商業方面的一切障礙，而使事業成功，他們並以此為傲。他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沒有他們那種幹勁和效率，這個公司或商號早就失敗了，這個家庭也早就衰落了。現在，那些「堂兄弟們」

不僅不感恩，反而口出怨言，這就難怪被人認為厚顏無恥了。

家庭的頭兒們與「堂兄弟們」之間的口角，如果只在家裏鬧鬧，不鬧出自家的大門，那也罷了。但是那些「堂兄弟們」爲要給頭兒們難受，有的就參加了反資本主義的陣營，並且以金錢資助各種所謂「進步的」運動。他們熱烈地支持罷工，甚至自家工廠的工人罷工，他們也支持^④。到了這時，問題就非同小可了。

大家都知道，現在有許多所謂「進步的」雜誌與報紙，其經費完全靠這些「堂兄弟們」的慷慨捐助。這些「堂兄弟們」也資助一些「進步的」大學、學院和學術機構，去做所謂「社會調查研究」，並且支持共產黨的一切活動。不僅如此，他們還滿口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所謂「普羅隊伍」(Proletarian army)反資本主義的鬥爭中擔任要角。

九、百老匯與好萊塢的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給了許多人可以安逸過活的進款和閒暇；這些人是要尋找娛樂的。於是戲院開演時總是擠滿了觀眾。著名的演員與作腳本的人，也就收入豐厚。他們住華麗、甚至有游泳池設備的房子，還可以僱用名廚烹調膳食。這般人，該不是飢餓線上的掙扎者吧！然而，好萊塢與百老匯，這些舉世聞名的娛樂業中心，卻是共產主義的溫牀。在那些堅決支持蘇維埃主義的一羣人當中，有許多是劇作家與演員。

對於這種現象，曾經有各種解釋。大多數的解釋多少都有一點真理，但都沒有指出那些舞臺上和銀幕上的名角爲甚麼要參加革命行列，甚麼動機在驅使他們。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消費者至上。要發財，就要靠消費者的光顧。就這一點來講，一個工業家所提供的勞務，與一個劇場老闆、一個演

員、或一個作脚本的人所提供的勞務，是沒有區別的。也即是說，這些勞務能否發財，都要取決於消費者的選擇。可是，由於認清了這一事實，那些以娛樂來滿足消費者的人們，對於自己的前程，比那些向消費者提供具體物品的人們，要擔心得多。

生產具體物品的人，都會知道他們的產品之所以有人買，是因為產品本身有些物質的性能。只要沒有貨色更好而價錢更低的同樣產品出現，他們可以相信大家還會繼續購買它們，因為這些產品所滿足的慾望不會在短期內有多大的變動。所以，精明的企業家對於產品的將來行情，在某種限度以內，是可以測知的。因而他們對於將來，能夠保持相當的信心。

至於娛樂業，情形就不一樣了。尋找娛樂的人，為的是解悶或消遣。解悶消遣就要靠新鮮玩藝。看慣了或聽慣了的東西，令人厭倦。娛樂業必須常常變化，推陳出新。顧客們所最喝采的是一些新異而令人驚奇的東西。他們的興致不專而難於捉摸。今天高興的，明天也許就厭煩了。舞臺或銀幕的名角、明星，總是耽心大眾的興趣轉移。他很明白，他今朝的紅得發紫，完全是靠那些尋找快樂的人們的興會與趣味，到了明天也許就被他們遺忘了。未來的新角，精力充沛的後生小子，將會取悅觀眾，奪去他的地位。這種憂慮經常使他苦惱。

名伶們的這種憂慮，很明顯地，沒有甚麼方法可以解除。因此，像落在水裏的人一樣，為著救命，一根草他們也要抓住。他們當中有些人就以為共產主義將可解救他們。他們想，「共產主義不是一種使人快樂的制度嗎？人類的一切罪惡都是來自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將會被共產主義打倒，不是許多名人都這樣講嗎？我們自己也是辛苦工作的人，難道不是勞工們的同志嗎？」

我們很可以講，好萊塢與百老匯的共產主義者，沒有一個人曾經讀過任何社會主義的著作，也沒有人好好地分析過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正因為這個事實，才使得那些影星、舞星、歌星們，以及那些喜劇的作者、電影本事的作者、歌曲的作者們，都迷失在一個幻想當中，以為一旦到了「剝削者」被剝削的時候，他們所特有的那些憂慮也就解除了。

有些人把娛樂業一些惡劣而淺薄的出品歸咎於資本主義。關於這一點，我們沒有討論的必要。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倒是好萊塢與百老匯的那般人，對於共產主義的支持比較美國任何其他方面的人士要熱烈得多。如果將來有一位歷史家，像法國滕氏(Taine)那樣，善於從小事方面尋找歷史事實的起源資料，那麼，他將不會不提到，世界著名的脫衣舞女郎在美國過激運動中所扮演的角色^⑤。

註 釋

- ①摩沙爾著：*No Promotion According to Merit*，一七七二年初版。(Justus Moser's *Sammliche Werke*, ed. B. R. Abeken, Berlin, 1842, Vol. II, pp.187-191)
- ②參考列寧著：*State and Revolution*(*Little Lenin Library, No.14* 紐約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發行)pp. 83-84.
- ③不久以前，歐洲還有另一個辦法以保障財產不致被所有人浪費掉。從市場中賺來的財富，得以投資於大規模的地產，而這種地產因若干法律的規定，不致受競爭的關係而損失。英國的限嗣繼承法和歐洲大陸所實行的類似的繼承法，都是防止財產所有人出賣他的財產，以免他的後嗣受到損害。
- ④「最漂亮的汽車，由穿制服的司機駕駛，把一些婦女們送進工會的糾察隊，有

時加入罷工運動，而這種罷工所打擊的工廠，正是資助他們買汽車的工廠。」

Eugene Lyons: *The Red Decade*, New York, 1941 p.186.

⑤ 參考 Eugene Lyons 同書 p.293.

第 2 章

普通人的社會哲學

一、資本主義的本身與普通人眼中的資本主義

經濟學，作為一個新的知識部門而出現，是人類史上若干了不起的大事之一。由於它為私人資本主義的企業開闢了發展的途徑，一切人事在短短幾個世代當中所發生的變化，比已往一萬年所曾經發生的變化還要大。資本主義的思想方法與行為方法，對於人們的福利有驚人的貢獻，住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時時刻刻享受其惠。

最奇怪的事，就是資本主義帶給人世間的空前變化，竟是得力於極少數著作家的教導和極少數政治家對於這種教導之接受。至於一般熙熙攘攘的衆人，乃至工商界大多數的人，都不能了解放任主義的精髓，儘管工商界的人在事實上是推行放任主義。市場經濟功能，即在自由貿易的全盛時期，也只有極少數人完全了解。西方文明之進入資本主義，完全由於少數傑出人士的導引。

在十九世紀初期，許多人對於當時的許多新問題，感覺生疏，同時又以不易適應而感覺苦惱。從滑鐵盧之役到克里米亞戰爭這個期間，英國人所特別歡迎的書籍莫過於經濟學的論著。但是，這個風尚不久

就減退，經濟學不合一般讀者的口味了。

經濟學，一方面與自然科學、技術知識不同，另一方面也與歷史學、法律學不一樣。其間的差異程度，使得初學經濟學的人覺得它特別生疏討厭。經常在實驗室、檔案室、圖書館內做研究工作的人，對於經濟學所特有的啓發性抱持懷疑態度。經濟學在知識方面的特點，自一般固陋而狂熱的實證論者看來，又似乎荒謬不經。經濟學應該是甚麼，人們已有了成見；他們想從一本經濟學書籍中找到合乎他們成見的知識，即是說，他們是以物理或生物學的邏輯結構來假想經濟學。結果，他們迷惘了。於是，對於那些需要特別用心去分析的問題，他們也不認真地把握了。

因為如此，所以人們把經濟方面的一切改進，都歸功於自然科學與技術知識的進步。自他們看來，在人類歷史行程中，實驗的自然科學有其自動進步的趨勢，因而科學在技術方面的應用也就日益進步。

這個趨勢是不可抵抗的，是人類命運註定的。無論政治與經濟是怎樣的形態，這一趨勢總會在社會裏發生有力的作用。自他們看來，最近兩百年來技術方面空前的進步，並不是這個時期的經濟政策所促成，換言之，這些進步不是古典的自由主義、自由貿易、放任政策與資本主義的成果，在任何其他的經濟制度下，一樣地也會有這些進步。

馬克斯主義之受人讚賞，沒有別的原因，只是因為他的主義採納了這種流行的見解，同時把這種見解籠罩在一種偽哲學的紗幕內，因而既可使黑格爾唯心主義者滿意，也可使淺薄的唯物論者心服。在馬克斯的詭論中，「物質的生產力」是一種超人的東西，獨立於人們的意志與行為以外。它遵循它自己的發展途徑，而這個途徑是被一些莫名其妙而又莫可如何的法則所支配。物質生產力神秘地在變動，而其變

動逼得人類要調整社會組織以求適應，因為物質生產力不能讓社會組織束縛住。歷史的主要內容，就是物質生產力從社會束縛中力求解脫的奮鬥史。

照馬克斯的說法，過去物質生產力體現在手動的工具；那時人事關係就照封建制度來安排。後來，玄妙的法則使物質生產力從手動的工具進化到蒸汽機的時候，資本主義就代替了封建制度。此後，物質生產力再向前發展，必然地是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誰也阻擋不住。歷史進化的潮流是不能逆堵的。

所謂左派的若干政黨，其觀念，有許多方面彼此不同，但他們在這一點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們都把物質方面的進步看作是自動的。

美國工會的會員，把他的高度生活水準視為當然。他以為他應該享受前代最富的人以及當代的非美國人所得不到的享受：這是命運註定了的。他不知道，大規模工商業的個人主義對於他說的「美國的生活方式」之形成是有很大助力的。在他的心目中，經理部門是代表剝削者。他以為，在歷史演進的過程中，他的勞動「生產力」之繼續增加，是個不可抑制的必然趨勢；既然如此，生產成果的增加當然要屬於他。在他的功績觀念中，資本主義時代工業產品的增加，應由參加的工人分得，而這分得量是繼續增加的。

其實，所謂勞動生產力的增加，是由於使用了較好的工具與較好的機器。在現代工廠裏面，一百個工人在每個單位時間內的生產量，比較手工業時代工作坊裏一百個工人所生產的增加了好幾倍。這種進步並不是由於工人方面的技巧、才幹或勤勉的增高。事實上，中古手藝工人所需要的熟練程度，遠比現代工業許多部門的工人所需要的要高得多。

其所以如此，是因為現代工業使用了效率更高的工具與機器，而這些工具與機器的發明與製造，則由於資本的累積與投資的增加。

「資本主義」、「資本」、「資本家」這些名詞，馬克斯都給以詭譎的含義。今天，還有許多人——包括美國政府宣傳機構的若干人員在內——也同樣地以那種含義來使用這些名詞。但是，最近兩百年以來，人口不斷地增加且一般生活水準又空前提高，這種驚人成績的造就，有其主要因素；而這主要因素，就由這些名詞表達出來。

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工業水準，與以前的生產水準，以及與今天工業落後地區的生產水準之不同，就在於資本供給量的懸殊。如果資本不藉儲蓄而大量累積的話，技術的進步也沒有用處。

儲蓄，資本累積，一步一步地把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推進到現代化的工業生活。這種進化得力於甚麼？得力於生產手段私有制的確立。只有在這個制度下，資本累積才成為可能，因為它給資本累積以安全的保障。

走向富庶的每一個步驟，都是由儲蓄推進的。如果不藉儲蓄來增加資本財，技術上縱有巧妙的發明，實際上也無用處。

由於有儲蓄才會有資本財，於是企業家就得以使用資本財來滿足消費者尚未滿足的最迫切的經濟慾望。同時，技術家在生產技術方面力求改進。在經濟進程中，他們也是要角。這三種人——儲蓄者、企業家、技術家——是經濟進程中的先驅。其餘的人因先驅者的活動而受惠。他們儘管也各有工作，但其工作對於經濟進程中變化的發生，並無任何直接的貢獻，他們只分受其惠而已。

把這三種先驅分子努力的成果，分配給非先驅分子（佔社會的絕大多數），這是市場經濟的特色。超過人口增加的資本累積，一方面使勞

動的邊際生產力提高，另一方面使產品的價格低廉。市場程序，讓大眾有機會分享他人成功的果實，同時，它又驅使三種先驅分子盡可能地以最好方法為千千萬萬的非先驅分子服務。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每個人都可自由地成為先驅者。這三種先驅者並不形成不可逾越的階段。他們並不享有甚麼較高權力所賜予的特權，他們的祖先也沒有傳遺甚麼特權給他們。他們不構成排外的會社，而其中心人物沒有權力可以排斥後起的人。成為一個資本家、企業家、或新技術的發明者所必要的條件，是智慧與意志。富人的後嗣，在開始時雖然比別人便利，但一進到競爭市場的時候，他就不一定比別人佔便宜，而且有時比新進者更費勁，更少得到報酬。因為他面對市場情況的變化，不得不重新調整他所繼承的產業以求適應。例如，最近二三十年鐵路大王的繼承人所遭遇的問題，就比新興的交通事業——汽車運輸業與航空運輸業所遭遇的問題，要棘手得多。

以上這些事實，都被一般人所接受的大眾「哲學」所誤解了。像某甲所想像的，現代工業之所以日新月異，是由於一種叫做「進步」的神秘因素。至於資本累積、企業精神與技術精巧，對於自然發生的進步，毫無幫助。

把某甲的這種神秘觀念，用之於勞動生產力的增高，那就是，勞動生產力的增高是自然發生的；不幸得很，在這罪惡的世界，有人對人的剝削。像《共產黨宣言》所指出的，資本家掠奪生產力的成果，而留給勞工——一切好東西的創造者——的，不過是「維持他們生命與延續後代所必要的」。因此，「現代的勞工不能隨工業的進步而擡頭，反而日陷於水深火熱……他一天比一天貧窮，同時貧民羣的擴大，比人口與財富的增加來得快。」把資本主義的工業描寫成這樣的作者，在大

學內被推崇為偉大的哲學家與人類的救星，而其教條被千千萬萬的人奉為聖旨。可是，這千千萬萬人的家裏，都有收音機與電視機的設備！

教授們、「勞工」領袖們、政客們都在說，最厲害的剝削是大規模的工業造成的。他們沒有看到，大工業的特點在於大量生產，而大量生產為的是滿足大眾的需要。在資本主義下，工人們本身，直接或間接是一切工業產品的主要消費者。

在資本主義初期，工業的新奇產品，在出現以後總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被大眾享受。大約在六十年以前，達德(Gabriel Tarde)講得很對。他說，工業界的新奇產品，在成為每個人的必需品以前，只供少數人的享樂；但是，這些起初被視為奢侈品的東西，後來都成為大家的日常必需品了。這種說法，也可適用於汽車的發明與其大眾化的時間過程。但是，目前大工業的大規模生產，已經把這個時間過程大大地縮短，縮短得幾乎沒有時間距離了。現代工業的新產品只有大規模生產才有利可圖，因此，新的產品一經出現，馬上就可給大眾享受。例如，電視、尼龍襪、或罐頭的嬰孩食品，從出現到大眾享受，在美國看不出有時間的距離。事實上，大規模的工業使大家的消費與享樂都趨向於標準化。

在市場經濟中沒有貧困的人，因為有些人是富有。某些人富有，決不會造成另一些人的貧困。相反地，使得某些人富有的那種過程，也就是其他許多人的慾望得以滿足的過程。企業家、資本家、技術家的發財，靠的是以最好的方法為一般消費者服務。

二、反資本主義的陣線

推行社會主義與恢復干涉政策，這兩個運動剛開始的時候，精通

經濟理論的人就已經看出它們的害處。但是，那些革命家與改革者的觀念，竟得到許許多多無知的擁護，而這些人完全是受了人類情感中的妬與恨的驅使。

啓蒙時期的社會哲學爲自由的具體實現——完成於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經濟自由與代議政治的政治自由——鋪好了大道，但它未做到根絕舊時代的三大勢力：君主政體、貴族、教會。歐洲的自由主義者只想以君主立憲代替君主專制，並不要重新建立共和政府；他們只要取消貴族階級的特權，但不想褫奪貴族們的爵位與財產；他們熱心於使每個人有信仰自由，終止教派間的迫害，但他們又讓所有的宗教與教派在追求其精神目標時有完全的自由。所以舊時代的三大勢力仍然保存。有人也許以爲，那些固執於保守主義的帝王、貴族和僧侶們應該是反對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者攻擊西方文明的精髓，同時他們也不諱言，在社會主義的全能政治下，他們所謂的專制、特權與迷信的餘孽，都沒有存在的餘地。

然而，這三個特權階級的人們，也是情感沖暈了理智，妬與恨終於叫他們與社會主義者攜手了。他們也不管社會主義的目的在於沒收他們的財產，他們也不管在全能政治下沒有任何的宗教自由。德國霍亨左倫王室(The Hohenzollern)首先實行一個美國觀察者稱爲「君主社會主義」的政策^①。俄國獨裁的羅曼諾夫王室(The Romanoffs)利用勞工組合主義做武器，打擊「布爾喬亞」建立代議政治的企圖^②。

在歐洲每個國家，貴族們竟然與資本主義的敵人合作了。各地著名的神學家也對自由企業制度不表示信任，暗中支持社會主義或激烈的干涉主義。現在，有些基督新教的傑出首領，如瑞士的巴茲(Barth)、布任若(Brunner)、美國的尼布爾(Neibuhr)、梯里琪(Tillich)，以及坎

特布里 (Canterbury) 已故的大主教威廉·鄧普爾 (William Temple)，都公開地咒罵資本主義，甚至把俄國布爾雪維克的一切罪行也歸咎於所謂資本主義的失敗。

六十多年前，威廉·哈科耳特 (Sir William Harcourt) 曾經講過：「我們現在都是社會主義者。」這句話聽起來也許叫人驚奇。但是，今天的政府、政黨、教員、作家、好戰的無神論者與基督教的神學家，幾乎一致地從情感上厭惡市場經濟而稱讚國家萬能的「好處」。這一代的青年，是在這一種沉醉於社會主義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社會主義的意理，其影響可從輿論方面看出。人們爲甚麼要參加社會主義的政黨或共產黨？輿論的解釋，幾乎毫無例外地這樣講：當然啊，沒有錢的人是贊成急進改革的，例如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只有富人纔有理由要維持市場經濟。這種說法就是承認了社會主義的一個基本觀念，認爲大眾的經濟利益受了資本主義的害，資本主義只是爲剝削者謀利益的，要改善衆人的經濟生活，就得實行社會主義。

然而，人們之要求社會主義，並不是因爲他們「知道」社會主義會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厭惡資本主義，也不是因爲他們「知道」資本主義會傷害他們的利益。他們之成爲社會主義者，是因爲他們「相信」社會主義將會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們厭惡資本主義，是因爲他們「相信」資本主義會損害了他們。他們盲目地在妬與恨的驅使下成了社會主義者。他們決不研究經濟學；經濟學家對於社會主義體無完膚的批評，他們是不理睬的。因爲在他們的心目中，經濟學的抽象理論簡直是無稽之談。他們自以爲只信任經驗。可是，經驗中有些不容否認的事實，他們也以同樣頑強的態度不予承認。例如一般人的生活水

準，在資本主義的美國就比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天國」不知要高出若干倍。

談到經濟落後國家的人民，他們也同樣地拿出那個錯誤的推理。他們以為，那些國家的人民，正因為窮困，「當然」要同情共產主義。

很明顯地，貧窮的國家是想解除貧窮，改善人民生活。為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所採取的經濟制度，應該是最足以保證達成這個目的的制度；資本主義就是這種制度，他們應該決定採用它。但是，他們竟受反資本主義的觀念欺騙，而傾向於共產主義。

這些東方國家的政治領袖們，一方面羨慕西方國家的富庶，另一方面又不採用西方國家致富的方法，而沉迷於俄國的共產主義；俄國共產主義正是造成俄國及其附庸國貧困的原因。這真是一個矛盾現象。

更矛盾的，是美國人。正在享受資本主義成果的美國人，也要頌揚蘇維埃制度，並且以為亞非的貧窮國家「當然」要傾向共產主義，反對資本主義。

是不是每個人都應該把經濟學認真地研究一下？這是一個不能獲得一致答案的問題。但是，有一點是很確定的：一個人如果沒有充分地研讀經濟學，而居然以言論或寫作對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公開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那簡直是不負責任的胡說八道。

註 釋

①參考 Elmer Roberts, *Monarchical Socialism in Germany*, New York, 1913.

②參考 Mania Gordon, *Workers Before and After Lenin*, New York, 1941.

第 3 章

資本主義下的著作與出版

一、作品的市場

資本主義為許多人提供機會，使他們的創造才能得以自由展現出來。階級社會是要每個人循規蹈矩，不容許違背傳統的行為軌範。資本主義鼓勵人們革新：利潤就是一種獎金，獎給那些放棄成規而獲致成功的人；損失就是一種罰款，懲罰那些墨守成規，不求改革的懶漢。在資本主義下，每個人都可自由採取比別人更好的方法來做事。

然而，這種個人自由也是有限制的。它是市場民主的結果，所以它要靠消費羣對於個人成就的欣賞。在市場上能否獲利，不是看你做得好不好，而是要看有沒有足夠的消費者承認你做得好。如果一般買主都不能欣賞你的產品，即令產品特別優良，所有精神的與物質的成本都白丟了。

資本主義這個制度，就是一個為滿足大家需要而大量生產的制度。它是造福於一般大眾的。它把平均的生活水準提高到前所夢想不到的高度。它使成千成萬的人能夠得到一二百年以前極少數人的享受。

顯著的事例，就是各種各類的產品已有其廣泛的市場。作品——就

其最廣泛的意義來講——是今天千千萬萬的人所需要的一種貨物。他們看報、看雜誌、讀書，他們收聽廣播，他們擠進劇場。那些滿足大眾慾望的作家、導演和演員們，賺得大量的金錢。在分工的社會結構裏面，又出現了一個新的再分工，即有了作家這一行業，他們靠寫作爲生。這些作家們在市場上出賣他們的勞務或作品，正同其他所有的專業者出賣勞務或產品一樣。他們正是以作家的資格結合在合作而分工的市場社會中。

在資本主義時代以前，寫作是一種無報酬的工作。鐵匠鞋匠能夠謀生，著作家不能。寫作不是職業，只是某些人的一種愛好。只是國王、貴族、政治家、及富有資產者的高尚工作。此外，如主教、僧侶、大學教授、軍官們在閒暇的時候纔能寫作。一文莫名的人，如果迫於強烈的情感而要從事寫作的話，必須首先以其他方法謀得生活之資。史賓諾莎(Spinoza)磨過鏡子，穆勒父子(James Mill 與 J.S. Mill)二人都在東印度公司的倫敦辦事處工作過。但是大多數貧窮的著作家，都靠有錢的朋友們慷慨幫助以爲生。國王們也常常搶著來保護詩人與作家。許多宮廷成了著作家的收容所。

歷史的事實是這樣：這種保護制度曾給著作家以充分表達的自由。當時的保護者並不把自己的哲學、自己的倫理觀念、自己的好尚，強迫被保護者接收。教會要加害於作家的時候，他們也常常熱心地出來庇護。在這一風尚之下，一個作家如果被某一宮廷或某數個宮廷驅逐，他也可能找到一個敵對的宮廷作他的避難所。

但是，長期地優游於宮廷倖臣之間，靠君主的眷顧而生活的哲學家、歷史家和詩人們，其想像力不會有很好的啓迪性。所以從前的開明人士，對於經濟制度演進到作品也成爲市場商品的時候，特別表示

歡迎。因為這是把著作者從國王貴族的保護中解放出來。他們以為，從此以後，知識階級的見解與判斷將是高於一切的。好一個錦繡前程，這是個多麼令人驚喜的希望啊！

二、書籍市場上的成功者

但是，事實沒有想像的那麼美。

著作，不是在遵循舊說，而是要提倡異議。有些著作家只會重述大家所承認和大家所想聞知的東西，這種著作家並不重要。值得重視的是有革新精神的、提倡異議的、能夠說出前所未聞的事物的，以及反對傳統的標準，而以新的價值與觀念代替舊的價值與觀念的那些作家。這種作家，必然地是反權威、反政府，而與其同時的多數人立於不妥協的反對地位。這樣的作家，其著作是大部分的人所不購買的。

不管你對於馬克斯與尼采(Nietzsche)是怎樣的看法，但是沒有人能夠否認他們死後的聲勢曾經大得不可抵抗。可是他們生前如果沒有其他的收入而只靠版稅的話，他們一定早已餓死。提倡異議的作家，沒有希望在正常市場上賣出他的著作。

書籍市場上的大亨，是那些為大眾寫小說的作家。如果說，那些購買者總是喜歡買壞書而不買好書，這也是錯誤的說法。其實，他們是缺乏鑑別力，有時他們也購買很好的書。出版的小說和劇本，固然大部分是不值一顧的，可是，每年有成千成萬的書籍出版，又焉得不如此呢？儘管如此，如果在這成千成萬的出版品當中，僅有千分之一的書籍比得上過去的偉大作品，那麼，我們這個時代仍不失為著作燦爛的時代。

許多批評者，總喜歡把他們所說的作品墮落這一現象，歸咎於資

本主義。其實，他們或者應該歸咎於自己沒有能力辨別糟粕與精華。他們的眼力比百年前的人更敏銳嗎？舉例來說，今天所有的文藝批評家都滿口讚賞史騰達爾(Stendhal)，但史騰達爾在一八四二年去世的時候，只是一個沒沒無聞而被人誤解的人。

資本主義使得大家手頭寬裕，可以隨意購買書籍雜誌，但資本主義又不能夠教大眾鑑賞米栖那斯(Maecenas)或史肯那(Can Grande della Scala)的作品。普通人不能欣賞非普遍的書籍，並不是資本主義的過錯。

三、關於偵探小說

在這個有了強烈的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時代當中，文學作品中產生了一個新的流派——偵探小說。同時，英國那些擁護工黨的選民們，被瓦拉斯(Edgar Wallace)這一類的作家所鼓舞。著名的社會主義作家之一的柯爾(G. D. H. Cole)，名氣之大，並不減於一位著名的偵探小說家。一個馬克斯主義的信徒，應該把偵探小說——或者可以包括好萊塢的電影、滑稽劇、和脫衣舞的「藝術」在內——叫做勞工組合主義與社會主義時代的文藝方面的上層結構。

許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與心理學家，對於這一新的流派之產生，曾經多方解釋。其中研究得最深刻的要算阿伊得洛提教授(W. C. Aydelotte)。阿伊得洛提教授說，偵探小說的歷史價值，就在於這些小說是描寫幻想，因而它可以吸引讀者。這種說法是對的。同時他更正確地說：偵探小說的讀者，每每把自己視同偵探，換句話講，讀者每每把偵探當做「自我」的化身^①。

現在，偵探小說的讀者，是個野心受了挫折的人。我們已經講過，這種人總是在咒罵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公平，以自安自慰的。他的失敗，

是因為他忠實而守法。與他競爭而成功的人們，則由於他們的邪惡；他們用些卑鄙污濁的手段，而這些手段是純潔無疵的他所從未想到的。但願大家知道那些傲慢的暴發戶是如何的奸謀詭詐啊！不幸得很，他們的罪惡偏偏被隱瞞著，而他們反享受一種不應得的聲望。但是，畢竟有了這麼一天！他——他自己將要揭開他們的假面目，舉發他們的罪行。

偵探小說的標準情節，大概是這樣：一個被大家認為可敬重而毫無卑劣行為的人，曾經犯過大罪。沒有人對他懷疑。但是，像警犬那麼伶俐的偵探，是愚弄不了的。他窺破了這位道貌岸然的偽君子的一切。他搜集所有的證據來證明這個嫌疑犯所犯的罪行。謝謝他，正義得到了最後的勝利。

受著潛在的反資產階級的意識之影響，以揭開偽君子假面目為主題的作品，也常見之於較高級的文學著作中，易卜生(Ibsen)的《社會的棟樑》(*The Pillars of Society*)就是一個例子。偵探小說則把這種題材弄得降格了，因為在偵探小說中，總有一個自以為正直的，做偵探的人物，喜歡對於大家所認為的好人加以侮辱。偵探的動機，是由於下意識對於成功的資本家企業家有了仇恨。政府的警察官員是與偵探相對稱的。警察官員對於疑難案件的解決，是不夠機敏的。在偵探小說中甚至暗示，警察官員的心理，不知不覺中受了嫌疑犯的社會地位的影響。至於偵探的成功，正是說明資產階級的政府之失敗，因為它委派了這樣的警察官員。

這就是偵探小說所以被那般受挫折的人們熱烈歡迎之理由（當然，偵探小說還有其他的讀者）。他們日夜在幻想如何向那些成功的人們洩恨。他們幻想到這麼一天：他們的對頭「手上釘了手銬，被警員帶走」。這

種滿足是偵探小說達到高潮的時候所給予他們的。在這個時候，他們就把那位偵探當作他們自己，而把那個俯首就擒的犯人當作勝過他們的對頭②。

四、出版自由

出版自由為自由國家基本特徵之一。在正統的自由主義政治綱領中，是少不了出版自由的。彌爾敦的《論出版自由》(John Milton's *Areopagitica*, 1644)與穆勒的《論自由》(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 1859)這兩本古典書籍的理論，從來沒有人可以稍稍地撼動它。不受檢查的出版自由，是言論自由、著述自由的生命線。

出版自由只有在生產手段私有的社會裏面才可存在。在社會主義下，印刷機構與發行的便利都被政府佔盡。誰可以有時間和機會從事寫作，怎樣的東西才可以印刷發行，都由政府單獨決定。在這樣的社會裏面，根本談不上出版自由了。回想起來，沙皇時代的俄國比起現在的蘇俄，似乎還像一個有點出版自由的國家。納粹黨人之查禁書刊，大興文字獄，完全是遵行一個社會主義者喀貝特(Cabet)的設計③。

如果所有的國家都趨向社會主義，那麼，著作家的自由就會一步一步地歸於消滅；也即是說，凡是內容為政府或權力者所不喜歡的書籍與論文，就會一天一天地難於發表了。持異說的人們，雖不會像在蘇俄一樣，都被清算；他們所寫的書，也不會像在中世紀那樣，由宗教裁判下令焚毀；同時也不會遭受以前的檢查制度的扼殺。可是那些自稱為「進步分子」的人們，可使用若干更有效的武器來扼殺出版自由，其中最具壓迫力的，就是他們聯合起來，以不合作的方式(boycutt)對付著作家、編輯人、出版家、書商、印刷廠、廣告商和讀者。

每個人對於他所不喜歡의書籍、雜誌和報紙，當然有不閱讀的自由；同時也有自由勸阻別人閱讀。但是，如果別人不受勸阻而依然愛護某些刊物和某些發行人，則以嚴重的威脅手段來報復，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在許多國家裏面，報紙與雜誌的發行人常常受到工會不合作的威脅。他們避免公開地討論問題，而默默地屈服於工會領袖的命令之下。④

那些所謂「工人的」領袖們，比往日的帝王們還要暴躁。對於他們是不能開玩笑的。因為諷刺文學、正宗的諧劇與音樂諧劇都爲之貶值，而電影故事也變得索然無味。

在法國大革命以前，戲院裏可以自由演出波馬社(Beaumarchais)嘲笑貴族的劇本，也可演出莫札特(Mozart)所編的不朽的歌劇。在法國第二帝國的時候，歐芬巴哈(Offenbach)與哈雷微(Halevy)的「基洛爾斯坦的大公妃」(Grandduchess of Gerolstein)，把專制主義、軍國主義和宮廷生活諷刺得啼笑皆非。拿破崙第三和歐洲的其他君主，對於取笑他們的戲劇，都有雅量去欣賞。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舞臺監督張伯倫男爵(The Lord Chamberlain)並不阻止吉爾柏特(Gilbert)與薩力凡(Sullivan)的音樂諧劇上演。這些劇本都是諷刺英國政府那一套神聖制度的。當舞臺上高聲朗誦嘲笑貴族院的臺詞時，許多貴族們都坐在包廂裏面心平氣和地靜聽。

我們這個時代，對於有權勢的人，已不能在舞臺上加以嘲笑了。就是對於所謂福利國家的工會、合作社、公營事業、赤字預算，以及一些其他特點，都不容人有不敬的表示。工會領袖與政府官員是不可侵犯的。今天，遺留給諧劇的主題，盡是些下流輕薄的東西。

五、學者們的偏執

對於今天流行的意理只作表面觀察的人，不容易看出那些輿論造型者的偏執和一些箝制言論的陰謀。在流行的意理中，關於若干重要的問題，似乎是意見紛歧。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干涉主義者，以及他們黨派中的各派各系，相互間經常有激烈的鬥爭，而其鬥爭的激烈程度，竟使得大家忽視了他們之間有些完全一致的基本「獨格碼」(dogma——這個字，我覺得這樣音譯比意譯「教條」、「武斷」等等似乎更恰切些。——譯者附註)。另一方面，少數有獨立思想而敢於對那些獨格碼抱懷疑態度的人士，其意見的發表則受到許多限制而不能到達一般讀者的眼前。「進步分子」用以宣傳和說教的機構，龐大得驚人。他們利用這些機構，很成功地在思想界定下了一些戒律。這些自稱「非正統派」的人士，那種不寬容的固執作風，統制了今日的思想界。

這些「非正統派」人士所遵奉的獨格碼，其本身就是許多矛盾和雜亂的教條的混合體。而且那些教條所依據的幻想，早已被人駁倒，而那些人士卻又把它們加以竄改，形成一個綜合而折衷的大雜燴。在這個大雜燴當中，有烏托邦思想的殘餘，有「科學的」馬克斯主義的碎屑；還有德國歷史學派、英國費邊社、美國制度學派、法國工團主義者、技術統治主義者(Technocrat——他們主張根據技術家及工程師的調查報告來控制工業資源及改組社會體系。這般人的理論及其運動，盛行於一九三二年。——譯者附註)等等的思想在內。這就是把葛德文(Godwin)、卡萊爾(Carlyle)、拉斯金(Ruskin)、俾斯麥(Bismarck)、索利爾(Sorel)、范布倫(Veblen)和一羣名氣較小的這類人物的謬見，再拿來重述一番。

貧窮，是由於不公平的社會制度而產生的。這個基本獨格碼為一

般人所一致信奉。他們認為，人類的原始罪惡在於私有財產的建立。這一原罪使極樂園的幸福生活歸於毀滅。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只有剝削者的自私自利得以滿足，公正的大眾，註定要陷於窮困與墮落。要使得所有的人都過很好的生活，就需要國家的權力來抑制貪婪的剝削者。「營利的」目的，必須以「服務的」目的來代替。

他們講，所幸萬惡的經濟剝削者擋不住改革運動。將來的日子一定是個計劃經濟時代，龐大的計劃由國家的中央機關來主持。到那時，所有的人都會富裕。本著這一理想，於是那些急於促進這種偉大改革的人們，就把自己叫做進步分子。因為，他們自以為是在為實現一個既理想又合乎歷史進化法則的目標而努力。他們對於所有持反對意見的人，不僅不能聽取其意見，而且一概加上「反動分子」的罪名。

從這些獨格碼的觀點出發，於是「進步分子」就對若干政策表示擁護，而這些政策是他們認為可以馬上減輕大眾困苦的。例如，他們提議：信用擴張、增加貨幣流通量、由政府或工會強制規定最低工資率、統制物價和租金，以及其他的若干干涉政策。

但是，經濟學家曾經解析過：像這一類的江湖方術，不會達到擁護者所希望的目的。相反地，採用這些方術，其後果將比以前的情形更壞。

信用擴張，將歸結於經濟恐慌的再度到臨。

通貨膨脹，使得一切貨物與勞務的價格突飛猛漲。

把工資率勉強地提到自由市場所決定的水準以上，將引起大規模的長期失業。

限價，將使被限價的貨物減縮它的供給量。

這些法則，經濟學家曾經證明其為顛撲不破。「進步的」冒牌經濟

學者，並沒有人做過反駁的工夫。

「進步分子」對資本主義的攻擊，主要是把經濟恐慌的循環與大規模的失業都視作資本主義固有的特點。殊不知事實恰恰相反，這些現象之形成，正由於想改善大眾生活而對資本主義的妄加干涉。證明了這一事實，即可把「進步分子」的意理一筆勾消。

可是「進步分子」決不會反駁經濟學家的這些指教，他們把這些指教遮蓋起來，不讓大家，尤其不讓知識分子及大學生去接觸它們，他們對於正確的經濟理論一概斥之為邪說而嚴加禁閉。這些理論的闡發者都被他們指名辱罵，不讓學生們去閱讀這些人的作品。

照那些武斷的「進步分子」看來，社會上有兩組人經常在為分配「國民所得」而爭執。有產階級，企業家與資本家（他們統稱之為「經理」），在國民所得的分配中留給「勞方」（即工人與薪水階級）的，從不多於最低生活維持費。

激烈分子，共產黨徒，主張褫奪經理們的一切。這種主張被那些痛恨經理們貪婪的勞工所接受，是很自然的事。但是，勞動階級中大多數是和平分子，不贊成激烈主張。他們拒絕共產主義，不想把所謂「不勞而獲的」所得全部沒收。他們所嚮往的，是中庸之道的計劃經濟、福利國家、社會主義。知識分子在經理與勞工之間的爭執中，被認為是超然的，於是，他們就處在仲裁者的地位。這般人——代表科學界的教授，以及文學界的作家——決不站在任何一方的極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他們都不袒護。他們採取溫和的立場，主張計劃經濟、福利國家、社會主義。凡是抑制經理們的貪慾，防止其濫用經濟權力的一切措施，他們一定支持。

在這種思想方法中所隱含的荒謬與矛盾，我們似可不必重新詳細

解析。這裏，只要指出三個基本錯誤也就夠了：

第一，我們這個時代，意理方面的大衝突並不在於「國民所得」分配上的爭執，詳言之，並不是兩個對立的階級各為本身爭取最大可能的分配而鬥爭。今天的問題，是在大家對於最好的社會經濟制度之選擇，不能一致同意。我們要問：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這兩個制度，那一個能夠保證生產力提高，因而提高人們的生活水準？也即是問：基於個人經濟計算而獲致的生產力的合理活動，在社會主義下能不能獲致？就這一點考慮，社會主義能不能代替資本主義？從社會主義者武斷的迷信來看，可知他們對於這些問題是堅決地拒絕檢討的。因為他們深深地中了獨格碼的毒，所以他們有一個預定的結論：資本主義是萬惡中的最惡，而社會主義則是「善」的化身。

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問題，是不容許分析的；誰想分析它，他就是大逆不道，就要遭受清算。現在的西方國家，雖然沒有像蘇俄這樣惡劣的情形，但這裏的社會主義者也一樣拒絕檢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問題。凡是作這種檢討的人，他們就橫加漫罵、誣蔑，乃至聯合起來斷絕社交關係。^⑤

第二，在經濟意義上，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沒有甚麼不同。這兩個名詞所指稱的，是同一的社會經濟組織，也即是一切生產手段都受政府支配的經濟組織。這一組織是與資本主義制度不同的，在資本主義下，生產手段是受私人支配的。

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是兩個同義的名詞。

馬克斯社會主義者奉之為基本信條的文件叫做《共產黨宣言》；另一方面，共產主義俄羅斯帝國的正式名稱又叫做「社會主義蘇維埃聯邦(U.S.S.R.)」。由此可知，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基本上是二而一、一而

二的。⑥

今天，共產黨人與社會主義者之間所存在的敵對態度，與兩方政策的終極目的毫不相干。他們之間的不一致，主要是對於蘇俄獨裁者的征服慾有不同的看法；再者，他們對於實現生產手段公有化的步驟——經由憲法程序或以暴力顛覆政府——抱不同的主張。他們之間的區別，如是而已。

經濟學者、政治家、官僚政客和其他人等所常說的「經濟計劃」、「福利國家」這類的名詞，在終極目的方面，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沒有甚麼差異。

「經濟計劃」的意思，就是要以政府的計劃代替私人的計劃。即是說，企業家與資本家不能自主地使用他們的資本，必須無條件地遵照一個中央計劃機構所頒發的命令而行事。

這就是把生產手段的支配權，從企業家與資本家的手中轉到政府方面去。

由此可知，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或福利國家看作與共產主義不同，以為它們是較溫和的辦法，可用以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這是一個嚴重的大錯。

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並不像某些人所相信的，是共產主義的預防劑。一個社會主義者，只要他不把本國的機密文件偷給蘇俄，不以暗殺手段對付反對者，那麼，他比共產黨人確實溫和得多。就這一點講，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差別，但這點差別，並不影響他們政治的最後目的之一致性。

第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兩個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私人支配生產手段與政府支配生產手段，是兩個矛盾觀念，而不只是相反的

觀念。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沒有所謂混合經濟(mixed economy)這樣的一個制度。那些誤信有中庸之道的人們，並不是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求一妥協，而是提出一個具有獨特形態的第三種制度。這個第三種制度，經濟學者叫做干涉主義制度，並不是把資本主義的某些特點與社會主義的某些特點結合起來，而是與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完全不同的東西。經濟學家斷言這種干涉主義不會達到它的主張者所預期的目的，只會引起更壞的後果。這種斷言，不僅是基於經濟學家自己的觀點，即從主張干涉主義者的觀點來看，也可以成立。作這種斷言的經濟學家，都不是極端分子，他們只是心平氣和地指出，干涉主義所不可避免的後果而已。

馬克斯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了許多明確的干涉手段，他們的意思很明顯地並不是想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求一妥協，而是以這些政策開步走，走向共產主義前途(殊不知這同樣的政策，竟成為今天的新政(New Deal)與公政(Fair Deal)的主要內容)。馬克斯與恩格斯並不以這些干涉政策為足夠，而只是因為這些干涉可以對社會舊秩序引發進一步的打擊，且為走向生產方式徹底革命的過程中少不了的步驟。

所以，「進步分子」的社會經濟哲學，即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一道護身符。

六、社會主義的小說與劇本

被社會主義迷住了的一般人民，喜歡閱讀含有社會主義的社會小說與劇本。沉迷於社會主義的作家，也正要供給這一類的讀物。這些作家們把一切不愉快的現實，都暗示為資本主義必然的後果。他們一方面描寫被剝削階級的窮困、無知、骯髒與疾病，一方面叱責剝削階

級的奢侈、顛頂，與道德墮落。總而言之，在他們的眼中，任何壞的事體、荒謬的事體，都是資產階級的；任何好的事體、高尚的事體，都是勞工階級的。

這些取材於窮苦生活的作家們，可以分為兩類：其中一類是在優裕的環境中成長出來的。他們的家庭或者是資產階級、或者是富農、或者是優厚的薪水階級。他們自己根本沒有一點窮困的經驗。他們在小說或劇本中所安排的那些腳色，事實上對於他們都是陌生的。這些作家，在動筆寫作以前，必須搜集他們所要描寫的資料，但是他們對於這些資料是無法以不偏不倚的態度來研究的。他們早已有成見，他們相信靠工資過活的人總是悲慘的。他們對於自己所不想知道的事情，一概不去理睬，只是尋找那些與他們的成見相符合的材料。他們接受了社會主義者所說的：資本主義制度使大家受苦受難；資本主義愈發展，愈接近於成熟，則大眾所受的苦難就愈深。他們所寫的小說和劇本，就是為證明馬克斯的這種獨格碼而設計的。

這些作家們所犯的錯誤，並不在於他們選擇悲慘窮困作題材，因為一個藝術家，原可選擇任何材料來表現他的藝術造詣。他們所犯的大錯，在於偏執地把若干社會情形加以誤述與曲解。他們不知道，他們所描繪的那些壞事是發生於資本主義不存在的場合；或者是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殘餘，或者是資本主義的運作受了政策的干擾。他們也不知道，資本主義之所以為大眾消費而大量生產，正是儘可能地在消滅窮困。他們描寫工人的時候，只想到工人是工廠裏的勞作者，從未想到工人也是消費者，消費他們自己所製造的產品或消費與這些產品相交換的食物和原料。

這些作家，當他們暗示他們所報導的那些壞事足以代表資本主義

的時候，他們顯然是在歪曲事實。有些關於大量生產與大量銷售的統計資料，已經很明白地顯示出來：標準的薪資所得者並不是在窮困中生活。

在社會主義的文學家當中，左拉(Emile Zola)是個傑出的人物。他所提示的典型，為一羣天資較低的作家所模倣。照左拉的意思，藝術是與科學密切關聯的。它必須以調查研究為基礎，再進而描繪科學所發現的事實。從左拉看來，社會科學的主要結論，是說資本主義為萬惡中的最惡；社會主義的到來，既不可免而且也是最合期望的。其實這是一種獨格碼。左拉的小說，「事實上是一大堆社會主義的說教術」^⑦。可是左拉的那番擁護社會主義的偏見和熱情，很快地被他的模倣者的「普羅」文學壓倒了。

「普羅」文學的批評家總以為，那些「普羅」作家所寫的都是無產階級生活經驗中的真實情形，一點也不摻假^⑧。但是，那些作家並不僅僅報導事實，他們是以馬克斯、樊布倫(Veblen)和韋伯夫婦(The Webbs)的觀點來解釋這些事實。這種解釋就是他們作品的要點所在，其特色就是為社會主義作宣傳。這些作家們，把他們所據以解釋事象的那些獨格碼，當作不可辯駁的自明之理，且為讀者所共信的，所以他們覺得用不著再明白說明，有時僅僅隱含地提及而已。但是，他們這種作法仍不改變這個事實，即：這些作家們在作品中所描寫的一切，都是基於社會主義者的教義和其假想的經濟結構。這些東西的本身既不健全，那麼，他們的反資本主義作品，其荒謬也就可知了。

第二類的「普羅」作者，是那些在普羅階級的環境中生長起來的人，他們在作品中就描寫這種環境。這些人脫離了手工業者的環境而實際參加職工的行列。他們不像「布爾喬亞」背景的「普羅」作家，

必須作特別研究以求了解工資收入者的生活狀況，他們可以從自己的實際經驗中獲得寫作資料。

這種親身的經驗告訴他們許多事情，而這些事情明明白白是與社會主義的教條相衝突的。天資聰明而肯努力的孩子們，生活在適當的環境中，並不難爬上較滿意的地位。「普羅」背景的作家們，其本身的成就就是這種事實的證據。他們知道何以他們自己會成功，而他們的兄弟朋友們則否。在上進的過程中，他們有很多機會遇到其他的青年，這些青年也和他們自己一樣熱心學習、努力上進，因而獲得成就。現在，與布爾喬亞生活在一起，他們更發現某甲之所以比某乙更能賺錢，因而顯得出衆，並不是由於某甲是一個惡棍。他們知道工商界人士和專門人才，有許多是從窮苦中自身奮鬥出來的。如果他們愚昧得看不出這種事實，他們也不會從窮苦中爬出來。人們的收入之所以有多有少的區別，並不是由於社會主義者所咒罵的那些因素。對於這一點，「普羅」背景的作家們不會沒有領悟到。

這樣的作家，既知道了實際情事，如果還要在寫作方面為社會主義說教，那就是自欺欺人。他們的小說與作品也就是不忠實的作品，因而也無價值可言。它們將比那些「布爾喬亞」出身的同道者所寫的東西，水準更低，因為那一類的同道者，至少會相信他們自己所寫的東西。

社會主義的作家們，並不以描寫資本主義下「犧牲者」的情況為滿足，他們還要繪影繪聲地來寫資本主義的受益者——工商界人士的生活與行為。他們傾注全力於向讀者解釋利潤是如何發生的。由於他們本身對於這種「骯髒」的問題，沒有親身的閱歷，他們一開始就得向「有資格的」歷史家所寫的書中找資料。下面那段話，就是那些歷

史家們告訴他們的關於「金融惡棍」、「強盜大亨」們發財的情形：

他的事業是從做牛販子開始的。牛販子，就是從農夫手中把牛買來，趕到市場上去賣。這些牛是要論重量賣給屠戶的。當牛羣快到市場的時候，他就把鹽餵給牠們，餵了鹽以後，再讓牠們喝大量的水。一加侖的水，重量有八磅之多。一頭牛灌進三、四加侖的水，賣出時過起磅來，增加的重量就很可觀。⑨

幾十幾百種小說與劇本，就用這種情節來描寫工商界人士卑劣的交易手段。大亨們的致富是由於出賣破銅爛鐵、腐敗了的食物、紙板做底的皮鞋、以及棉製的絲織品等等。他們賄賂參議員、州長、法官和警察。他們欺騙顧客和工人。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故事。

這些作家卻沒有想到，這樣的描寫，也即是暗示，所有其他的美國人都是白癡，以致很容易地受那些壞人的欺騙。上面所講的那種用水灌牛的勾當，是最原始最陳舊的騙術。到今天，我們很難相信世界上還有這樣愚蠢的買牛人，愚蠢到上這樣騙術的當。這種寫法，是把讀者看得太簡單了。一切相類似的謊言，都是如此。

在「進步」的作家們的筆下，工商界的人在私生活方面簡直是個野蠻人、是個賭徒、是個酒鬼。他們的時間，白天花在賽馬場，晚上花在夜總會，夜裏花在情婦的身旁。馬克斯與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布爾喬亞不以玩弄工人的妻女為滿足，更不屑於談到普通的娼妓。他們相互間引誘妻妾以取樂。」現在美國流行的小說與劇本，大部分是照這種說法來描寫美國工商界的。

註 釋

- ①參考 William O. Aydelotte, *The Detective Story as a Historical Source*. (*The Yale Review*, 1949 Vol. XXXIX pp. 76-95)
- ②一個有意義的事實，就是所謂內幕雜誌最近在美國出版界風行一時，而發行量也很可觀。這一類的雜誌，專門揭發功成名就者，尤其是富翁和電影明星們——的陰私和罪惡。照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一日出版的《新聞週刊》(*Newsweek*)所報導，某一內幕雜誌對於一九五五年九月份發行量的估計，高達三百八十萬本。這是說明，一般普通人都是喜歡暴露那些勝過他們的人的罪惡的，不管所謂罪惡是真的還是假的。
- ③參考：Cabet, *Voyage en Icarie*, Paris, 1848. p.127.
- ④關於天主教所規定的不合作辦法，參考 P. Blanshard, *American Freedom and Catholic Power*, Boston, 1949, pp. 194-198.
- ⑤儘管在我們這個世代，也有四、五位社會主義作家已開始檢討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譯者按：社會主義者如肯虛心研習經濟學，並把社會主義下的經濟問題詳加檢討，他就會變成自由主義者來反對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今日美國的蘇俄問題權威之一的易士第曼 Max Eastman 就是經過這樣一個轉變的人。一九五四年他寫了一本《社會主義的失敗》，足以警醒社會主義者的迷夢)，但是，我們在這裏所講的，確實是社會主義誕生以來，所有社會主義者的一致態度。
- ⑥史達林曾經在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杜撰些不同之點。關於這件事，可參考 Mises: *Planned Chaos*, Irvington-on-Hudson, 1949. pp. 44-46 (再見於 *Social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pp. 552-553)。
- ⑦參考 P. Martino 在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XV, p. 537 上所寫的。
- ⑧ J. Freeman, *Introduction to Proletarian Litera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Anthology, New York, 1935, pp. 9-28.

⑨參考 W.E Woodward, *A New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38, p.608.

在這裏，他描寫一個捐助神學院資金的商人的身世。

第 4 章

從非經濟的觀點反對資本主義

一、關於幸福問題的理論

攻擊資本主義的人們，常常這樣講：有了汽車、電視、冰箱，並不能使人幸福，而這些東西還有許多人不能享受。這兩點都是對的，但這並沒有打擊到社會合作的資本主義制度的身上。

人們之辛苦勤勞，並不是爲的十全十美的幸福，而是要盡可能地消除某些不舒適，因而可以生活得比以前快樂一點。某人購買一具電視機，正由於他覺得這個玩意兒可以增加他的享受，使他比沒有這個玩意兒的時候較爲快樂。如果不是如此的話，他就不會買它。醫生的工作不在使病人快樂，而在於爲病人解除苦痛。苦痛消除了，才可好好地追求人生幸福，才可以抵抗那些爲害於人生的一切因素。

我們知道，在佛教的托鉢僧當中（托鉢僧靠別人施捨點殘羹冷炙而生活），有些人確實是自得其樂而不羨妬他人富有的。但是，這樣的生活，究竟不是大多數人所可忍受的。大多數人總是不斷想改善生活環境，增加享受。誰想以一個亞洲的乞丐作爲美國普通人的生活榜樣呢？例如，資本主義最大成就之一，就是幼童死亡率大大降低。幼童死亡是做父母的最痛心的事故。資本主義這一成就，誰能否認它消除了許多

人的痛苦呢？

至於說，技術與醫藥上的發明並不有利於所有的人，因而攻擊資本主義，這也是沒有道理的。人類生活情況的改善，總是由智慧最高而精力最充沛的少數人領先的，其餘的一般大眾漸漸地跟著上來。新發明的東西，一開始只是少數人的奢侈品，漸漸地，一般人也可以購買得起了。鞋子與餐叉的使用，也是慢慢地推廣的。即使在今天，世界上還有很多人沒有使用過這兩樣東西，那麼，我們因此對鞋、叉的使用表示反對嗎？肥皂，現已大量生產，一般人都可享受。我們知道，開始使用肥皂的那些潤人，是促進肥皂大量生產的先驅。今天，如果那些買得起電視機的人們，因為有些人買不起而不買，那麼，更是妨礙電視機的平民化，而不是促進它平民化。❶

二、物質主義

此外，有些人罵資本主義為卑鄙的物質主義。他們對於資本主義之改善人類物質環境，不得不承認；但是，他們又說，資本主義使人類不再去追求高尚的目的了。它使人腦滿腸肥，而靈魂與心智卻為之空虛；藝術水準一落千丈；偉大的詩人、畫家、雕刻家、建築家，再也不能產生了。我們這個時代只產生些流氓惡棍。

藝術品的鑑賞，完全是主觀的。某些人珍視的東西，常為另一些人所輕視。一篇詩或一座建築，其藝術價值如何，沒有什麼尺碼可以衡量。對於沙脫爾（Chartre）的大教堂和費拉斯克慈（Velasquez）的繪畫特別欣賞的人，也許譏笑那些從未見過這些傑作的人是鄉下佬。在校的學生，當老師要他們讀《哈姆雷特》（Hamlet）的時候，也有人感覺頭痛。藝術品的欣賞，只有那些審美智慧特別高的人纔能興趣盎然。

附庸風雅的人，總是很多的。他們假裝有鑑賞力，對於古代的藝術品表示特別愛好，對於同時代的藝術家則毫不同情。虛偽地推崇古人，就是貶抑那些違背傳統法則而另創格局的新進。

約翰·拉斯金 (John Ruskin) ——喀萊爾 (Carlyle)、韋伯夫婦、蕭伯納 (Bernard Shaw) 等等也是如此——是為英國自由、文明與繁榮掘墳墓的人。他歌頌戰爭與流血，對於他所不懂的政治學，則妄肆批評，固執地詆毀市場經濟，而一味迷戀已往的行會制度。他崇拜古代的藝術家，但對於現代大藝術家喜斯勒 (Whistler) 的作品，則用卑鄙的詞句來侮辱，以致被告到法庭而以誹謗定罪。資本主義不僅是個壞的經濟制度，簡直是以醜惡代替美好、以渺小代替偉大、以垃圾代替藝術。這種偏見的普遍化，是得力於拉斯金所寫的那些東西。

藝術作品的欣賞，本來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因此，關於資本主義下藝術低劣的謬見，我們不可能用實證的方法或邏輯的推理來駁斥。然而，我們敢於說，資本主義時代藝術方面的輝煌成就，凡是頭腦清醒的人都不會加以藐視。

在這個「卑鄙而營利的資本主義」時代，音樂方面卻有高超的藝術表現。華格納 (Wagner) 與浮地 (Verdi)、伯里歐滋 (Berlioz) 與比才 (Bizet)、布拉姆斯 (Brahms) 與布刺克魯 (Bruchner)、吳爾夫 (Hugo Wolf) 與馬勒 (Mahler)、浦西尼 (Puccini) 與史特勞斯 (Richard Strauss)，這是多麼偉大輝煌的一個陣容啊！在這個時代，像以前的休曼 (Schumann) 與多尼側 (Donizetti) 那樣的大藝術家，也被這些更高的天才比照得黯然無色了！

此外，我們還有許多大作家如巴爾扎克 (Balzac)、福祿貝爾 (Flaubert)、莫泊桑 (Maupassant)、哲克布孫 (Jens Jacobson)、普魯斯特 (Proust) 等

的小說，和許多大詩人如韋俄(Victor Hugo)、惠特曼(Walt Whitman)、里爾克(Rilke)、夏芝(Yeats)等的詩篇。如果沒有這些傑出的人才，我們的生活該是多麼貧乏啊！

我們不要忘記法國的一些繪畫家和雕刻家，他們教我們若干新的方法來觀察世界，來欣賞色和光。

這個時代，各部門的科學都有很大的進步，這是大家所公認的。但是，有些人又這樣怨言：這些進步，主要的是專家們的成就，至於「整合」(synthesis)的工作，則是缺乏的。我們要問：現代數學、物理學、生物學的造詣，是沒有人可以抹殺的，那麼，像克洛齊(Croce)、伯格森(Bergson)、胡士爾(Husserl)、懷德海(Whitehead)這些哲學家的著作，又如何呢？

每個時代，藝術的造詣方面，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對於古代名作的摹倣，不算是藝術。藝術品之有價值，在乎有不同於衆的特色。這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時代風格。

頌揚古代的人，有一點似乎是對的，這是就建築方面來講。過去幾個世代，確實沒有留下來像金字塔、希臘寺院、哥德式的教堂、文藝復興時代的宮殿等那樣偉大的紀念物。在近代一兩百年當中，固然也建造了一些教堂、宮殿、學校、圖書館，但這些建築都缺乏創意的表現，只是些老的式樣，或把一些老式樣加以揉雜而已。我們這個時代的建築風格，只見之於大規模的公寓、政府大廈，和私人住宅。瞧不起紐約摩天樓，固然有點迂氣，但是我們也得承認，現代的建築確實比不上古代。古代建築有其特別優異的地方。

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宗教的建築來講，宗教的高度保守性是不容許任何革新的。至於大宮殿的建築，則又隨王朝與貴族的消滅而不再

有。企業家與資本家，無論反資本主義的人怎樣詆毀他們，他們的財富決不會像國王貴族們那樣，用之於窮奢極侈的建築方面。今天，也沒有一個人有足夠的財富可以興建像凡爾賽(Versailles)、或厄斯科立阿爾(Escorial)那樣的皇宮。以前的專制君王們，只要他們所眷顧的藝術家，能夠繪出建築圖案而為他們所歡喜，縱令是勞民傷財的大浪費，他們也可不顧輿論而下令興工。像這樣的事，現在已不會再有了。多數人的會議，不會輕於採納一兩個創意者的大膽設計。他們不能不顧及當時的輿論。

大多數人對於當代的藝術不會有公平的評品，這一現象，古今皆然。對於當代大作家和大藝術家表示敬重的，常常是限於少數人。大眾的情趣卑劣，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特點。資本主義的特點，倒是在於如此的事實，即：資本主義提高了大眾的生活水準，因而大眾也成了文藝——自然是低級文藝——的消費者。於是，書刊市場上就為他們湧出了許許多多卑劣的作品。但是，這種情形並不妨害大作家們創造不朽的作品。

有些批評者對於他們所謂工業藝術的低落感慨唏噓。他們常把那些藏在歐洲貴族的碉堡和博物院中的名貴家具，與大規模生產出來的便宜貨比較。但是他們竟沒有想到，那些被收藏的東西只是供少數富貴人家享受的。精緻彫刻的箱籠，嵌著玉石的椅桌，在較窮階層的小屋子裏面是找不著的。對於美國工人家中的便宜家具還認為不好的那些人，應該渡過格蘭特河(Rio Grande del Norte)，去看看墨西哥奴僕們毫無家具的住宅。現代的工業，當它開始供給大眾的家具，以提高大眾生活水準的時候，工業家所最注意的，是盡可能生產便宜的東西而顧不到美術的價值。後來，資本主義已經提高了大眾的生活水準，工

業家就漸漸地製造些精緻而美觀的東西出來。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活在優美環境當中的人們，一天多似一天。這個事實，只有深懷成見的人纔會漠視。

三、不公道

對於資本主義最動情感的攻擊者，就是那些罵資本主義不合公道的人。

實際的宇宙，有其不變的法則。凡是與這些法則相反的念頭都是幻想。幻想，只要止於幻想，倒也沒有甚麼害處。但是，一旦到了幻想者閉著眼不顧事實的時候，那就嚴重地妨礙了人類為改善物質生活的努力。

一切幻想中最壞的一個幻想，就是以爲「自然」曾經賜予每個人以某些權利。照這種說法，自然是慷慨的，對於每一個人都有施與。因此，每個人在人羣中，或者說在社會裏，各有應得的那一份權利；而這份權利是自然分派給他的。自然的永恆法則與神聖的公道觀念，不許任何人把自然賦予他人的東西據爲私有。窮人之所以窮困，只是因爲一些不講公道的人剝奪了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防止這種剝奪，須使得所有的人都富有，這是宗教與政府當局的任務。

這種說法，每個字都是虛妄的。自然並不慷慨，相反地，它是吝嗇的。它限制了人類生活資料的供給量。它在世界上播殖了許許多多妨害人類生活的動物與植物。它經常表演一些破壞性的威力，使我們人類遭受損害。人類生存之得以延續，以及人類福利之得以增進，靠的是善於運用自然所賦予的一個主要工具——理智。

人們在分工合作制度下創造的一切財富，幻想者以爲都是自然的

賞賜。

把這種財富的「分配」，取決於所謂神聖的或自然的公道觀念，實在是荒謬。照這種幻想，自然為人類提供了一項基金，每個人應該從中取得一份。這是何等的無稽之談！事實上，分配問題是社會制度的問題。我們所應研究的，是怎樣的分配制度才能夠繼續生產、擴大生產，生產大家所需要的東西。

基督教的世界總會(The 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一九四八年的宣言曾經這樣講：「公道的要求，例如，亞非兩洲的人民應該有更多的機器生產，以增進福利。」^②這句話的含義是說，上帝給了人類一定量的機器，並且希望這些機器平均地分配給各個國家。可是資本主義國家太壞了，它們據為己有的，已超過了「公道」所攤派的，也即是把亞洲國家應得的部分剝奪去了。無恥！

事實上，資本的累積與投資於機器(這是西方國家比較富裕的根源)，完全是資本主義、不受干擾的資本主義的功效。上述的教會宣言，則對這樣的資本主義妄加曲解，並以道德為理由加以攻擊。資本主義的意理與政策，本可以使亞非國家進化到資本主義階段；亞非國家的經濟落後，是因為不接受這種意理，不採用這種政策，並不是資本主義的罪過。

亞非國家不僅不採用資本主義的意理與政策，他們還反對外國人的投資，殊不知外人投資正是使他們「享有更多的機器生產」。亞非國家千千萬萬的人民之所以窮困，是因為他們自己要保守原始的生產方法，不採用較好的工具和最新的技術設計，以致經濟落後。這一事實，沒有人可以爭辯。

經濟落後地區的窮困，只有一個方法可以解除，就是充分實行不

受干擾的資本主義。他們所迫切需要的是私人企業、新資本的累積、資本家，和企業家。「公道」不能醫治貧窮；要免於匱乏，只有以健全的，即放任的政策代替不健全的、干擾的政策。

資本主義國家，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到今天這個程度，並不是得力於模糊的公道觀念，而是得力於那些被人罵為「粗俗的個人主義者」和「剝削者」的個人活動。落後地區的窮困，則由於他們的財經政策——公用徵收、不公平的租稅，以及外匯管制等，阻止了外人投資，同時也妨害了本國的資本累積。

凡是以道德為理由，罵資本主義不公道的人，都不了解資本是甚麼、資本怎麼形成、資本如何保持，以及把資本用在生產過程中將可得到甚麼利益。

資本財的增加，只有靠儲蓄。如果所有的生產品都消費了，就不會有新的資本增加。消費如果少於生產，而將剩餘的生產品用之於再生產過程，那麼，此後的生產過程中，就可以藉助於更多的資本財來擴大生產。所有的資本財都是中間財貨，在生產過程中遲早是會被消耗的。如果不從生產品中，為資本財準備新陳代謝的補充，則資本就會耗盡。到了那時，生產過程所能利用的資本財也就減少了，其結果就是僱用中的勞動與自然資源每單位的生產量為之減少。為了防止這種反投資的事態發生，必須努力維持資本，使生產過程中所消耗掉的資本財，得以不斷地補充。

資本不是上帝或自然的賜予，它是人們在消費方面節省下來的。儲蓄創造資本，也增加資本。要維持既存的資本，還得沒有反儲蓄的行為。

資本或資本財本身，並不能提高勞動與自然資源的生產力。只有

在明智的判斷下，把儲蓄的成果好好地利用或投資，才可以使每單位的勞力與自然資源，增加其生產額。否則，資本或資本財也就浪費掉了。

資本的累積、資本的維持，以及利用資本以提高勞動的生產力，這都是某些人勉力而行的結果。這些人包括資本家與企業家。前者因為儲蓄（或力戒反儲蓄的行為）而賺得利息，後者因善於利用資本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而賺得利潤。

如果資本家與企業家以外的一般人，沒有合理的經濟行為，則資本或資本財、資本家與企業家，也無法提高他們的生活水準。例如，工資所得者如果真的是照「工資鐵律」所講的，只知道把所得用之於吃喝與更多的生育，那麼，人口數字將隨資本累積額的增加而增加。

如果情形真的是如此的話，則來自資本累積的一切利益，將被人口增加所抵銷。但是，事實上，人類對於生活環境的改善，其感應並不像低級動物那樣。人除吃喝與生育以外，還有其他的慾望要滿足。因此，在資本主義的文明國家，資本累積額的增加超過人口的增加。其超過的程度，使得勞動的邊際生產力比較物質生產因素的邊際生產力更為增加。於是工資率就顯現出日益增高的趨勢。即是說，在總生產額中，工資、利息、地租這三項分配，工資在比例上日益增高。^③

說到勞動生產力，只有指稱「邊際的」勞動生產力，才有意義。在生產方面去掉一個工人，純生產額中所減少的生產量，就代表邊際的勞動生產力。它是一個確定的經濟量，一個確定的貨物生產量，或者以貨幣表示之。

至於普通談話中所說及的一般勞動生產力，則是一個不可捉摸的虛幻的觀念。基於這個模糊的觀念，於是乎有人以為，各個生產因素

在生產額中實質上所貢獻的分額，可以用一般的勞動生產力來測定。這完全是個幻想。假如有一個人用把剪刀裁開一張紙，在這裁紙的成績中，我們怎樣確定這個剪刀或剪刀的每一片佔多少分額，這個用剪刀的人又佔多少分額？

製造一部汽車，需要各種工具與機器、需要各種原料、需要各種工人的勞動，尤其需要一個設計者的計劃。這些生產因素的合作，是製造一部汽車所必要的。但是，沒有人可以確定，在一部製成的汽車中，每個生產因素所貢獻的分額各有多少。

爲著方便討論起見，暫時撇開一般人對於這個問題的一切謬見。我們只問：勞動與資本這兩個生產因素，那一個使生產增加？如果問題是這樣正確地提出的話，答案必須是：資本。今天，美國的生產額（就僱用中的每個工人來講）比較以前的時代，或者比較今天經濟落後的國家——例如中國——要高得多。這是因爲，美國現在的工人有更好和更好的工具在幫助他生產。如果資本設備（就每個工人而言）不比三百年以前爲多，或者不比今日的中國爲多，那麼，今天美國的生產額（就每個工人而言）也就不會比較高了。

不增僱工人，而可以增加工業上的生產總額，那就必須有新的儲蓄，使資本累積起來而有新的投資。勞動生產力之所以能夠倍增，就得力於這種新的儲蓄與投資。

由於資本不斷地累積，生產總額也就不斷地增加。在這續漲增高的生產總額中，工資率——工資所得者的分配額，也就續漲增高。何以會如此呢？因爲資本累積率超過人口的增加率。對於這個事實，政府方面是默而不言，甚至還要鄭重否認。但是從工會的政策看來，則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工會的領袖們是充分懂得的。因爲他們主張反移

民法，想把全國找工作的人數限制住，同時在每個地方性的勞動市場，他們也想限制新人進來。可是，這些工會領袖們，儘管內心上完全了解工資率增高的原因所在，而他們反要把我們所講的這個理論公開地加以侮辱，說是爲卑鄙的布爾喬亞階級作辯護。

工資率的提高，不是靠各個工人的生產力，所靠的是「邊際的」勞動生產力。此所以個人的生產力雖毫無變動，而其工資率也會上漲。

像這樣的職業，有的是。現在的理髮匠與兩百年以前的理髮匠，同樣地爲人理髮。今天在英國首相餐桌旁邊的侍者，與當時在皮特(Pitt)、帕爾麥斯吞(Palmerston)餐桌旁邊的侍者，同樣是伺候人。在農業方面，現在還有幾樣工作仍舊使用幾百年以前的那些工具。然而，這些工作者今天所賺得的工資率遠比以前的爲高。其所以如此，是因爲工資率是決定於邊際的勞動生產力。就僱用侍者這個事例來講，僱用一個人做侍者，即是不讓這個人被僱於生產部門。所以僱主給一個侍者的工資，必須等於生產部門多僱一個人所可增加的產額。所以，這個侍者的工資之所以高漲，其原因並不在侍者方面，而是因爲投資的增加超過了工人人數的增加。

所有蔑視儲蓄與資本累積的冒牌經濟理論，都是荒謬的。資本主義社會之所以比非資本主義社會富裕，就是前者比後者有較多的資本財可以利用。

工資所得者的生活水準之得以提高，是由於資本設備，相對於工人人數而言，曾經增加，所以，在生產總額中續漲增高的那一部分，總是歸於工資所得者。

只有一個方法可以不斷地提高工資率，使工資所得者受惠——這就是使資本加速地增加，超過人口的增加率而增加。這種說法，誰也

不能指出一點弱點出來。如果這就是「不公平」，那只好怨天而不能尤人。

四、自由與社會主義

一部西方文明史，是一部爲著自由而不斷鬥爭的記錄。

人們爲生存而奮鬥，爲改善物質環境、增進福利而努力。他們奮鬥與努力之得以有成就，根本的、唯一的原因，是在分工之下的社會合作。但是，社會和平生活的維持必須藉助於法制，否則無以防止刁悍之徒的搗亂，於是就有了國家與政府。可是，有了國家與政府之後，問題又來了；即是要防止政府當局或官吏濫用權力，使其不能把人民變成事實上的奴隸。所有爭自由的鬥爭，其目的就在於把政府官吏與軍警的權力限制在一定的範圍以內，使其不能任意地爲害人民。個人自由在政治上的意義，也就在此。

自由這個觀念，可說是西方所特有的。東方與西方的分別，最重要的一點，就在於東方人的腦子中從來沒有像西方那樣的自由觀念。古代希臘人之所以永久光榮，就因爲他們對於保證自由的那些法制，首先理解其意義。在科學方面，有些原始的貢獻，以前是歸功於希臘人的，據最近歷史學家的研究，實在是溯源於東方。但是，關於自由觀念之起源，是始於古代希臘城市國家，卻從來沒有人爭辯。希臘哲學家、歷史家的著作，把自由觀念傳給羅馬人，後來又傳給現代的歐美。於是它成爲建立西方良好社會的主要基石。它孕育了放任哲學，而放任哲學引導出資本主義時代一切空前的成就。

現代的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要保障個人自由，以防止來自政府方面的侵害。

代議政治與法治、司法獨立——法庭不受行政部門的干涉、人身保護狀(habeas corpus)、司法檢查與行政救濟、言論與出版自由、政教分立以及其他許多法制，所為的目的只是一個，即：防止政府官吏胡作妄為，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

資本主義時代，農奴與奴隸的痕跡，徹底消失了；慘無人道的酷刑已經終止，刑罰已減至僅夠防止犯罪行為所必要的程度；對於嫌疑犯，已不再用苦刑或其他可遭非議的方法去逼供；一切特權都已取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人民已從君主的屬下變成了自由公民。

物質生活的改善，是這些政治改革與更新的結果。因為一切特權都消失了。每個人都有權利向他人的既得利益挑戰。於是聰明才智之士得以放手作為，發展新興工業，使大眾的物質生活更為滿足。人口增加，但增加了的人口，仍能夠享受比他們祖先更優裕的生活。

在西方文明的國家，雖也有人曾經主張專制政治——對內絕對的君權或貴族政治，對外征服其他民族。但到了啓蒙時期，這種聲音漸漸微弱了，起而代之的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在十九世紀初期似乎是個不可抵抗的潮流。大多數的哲學家與歷史家，都以為歷史的進化是趨向於自由制度的確立，任何陰謀與詭計都阻擋不住。

談到自由主義的社學哲學，大家往往忽略了一個有助於自由觀念成長的重要因素，這個因素即希臘時代的著作。在希臘時代的學者當中，固然也有主張萬能政府的，像柏拉圖這樣的人；但是希臘意理的要點，還是在追求自由。以現代的政治組織作標準，來看希臘的城市國家，它們當然是寡頭政治。希臘的政治家、哲學家和歷史家讚美為至寶的自由，只是少數人所享有的特權。住在希臘城市的外國人與奴隸，是沒有自由可享的。讚美自由的那些人，實際上是擁護世襲的寡

頭政治。雖然如此，我們決不能以為他們之讚美自由是虛偽的。如果我們這樣想，那就大錯而特錯。事實上，他們對於自由的歌頌與追求，其熱忱並不減於兩千年後、在美國獨立宣言上簽字的那些蓄奴的人們。後來，各國的孟拉科馬克(Monarchomachs)的觀念^①、英國民權黨的宗旨、亞爾佐休士(Althusius)、格老秀斯(Grotius)、洛克(John Locke)等人的學說，以及一些現代憲法與人權清單起草人的意理，都是從希臘時代的政治思想產生出來的。在斯圖亞特王朝(the Stuarts)的英國、波旁王朝(the Bourbons)的法國，以及被一羣專制君主所統治的意大利，能夠使自由精神為之覺醒的，也靠的是希臘思想的傳習。甚至在腓德烈·威廉第三(Frederick William III)的普魯士大學的文預科，以希臘羅馬的文學為基本教材的教育，也成了共和主義的堡壘。對於這一事實，俾斯麥曾經作證^②。俾斯麥是十九世紀當中，僅次於梅特涅(Metternich)的自由主義的大敵人。他把學校課程中含有自由教育的古典課程一律刪除，這又說明奴役思想的復活。

一百年以前，能預料到反自由的觀念註定地要在一個很短的時期內佔有優勢的，只有極少數人。當時，自由理想似乎深植於人心，不是任何反動力量所可根絕，誰也不敢公開地反對自由、直率地鼓吹反動。但是，反自由主義者卻可在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掩飾下，把人們的思想引入自由的歧途。

精明的人不會看不出，社會主義者、共產黨徒，和主張計劃的人，都是想消滅個人自由、建立萬能政府的。可是，大多數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卻以為，他們是為自由而努力於社會主義之實現。他們把自己稱之為左翼民主人士，現在，他們甚至也冒稱「自由主義者」。

這些知識分子和其附和者的心理因素，我們曾經解析過。他們有

志未遂，是由於自己的缺點。這一事實，在下意識裏他們完全知道。他們知道，這是由於自己的不夠聰明，或者是不夠努力。

他們雖然知道這一事實，但他們不願明白承認自己的劣點，而要找一個替罪的羔羊；於是，就把自己的失敗歸咎於社會經濟組織的不公平。他們以此自安自慰，並且教別人也如此相信。他們宣稱，在資本主義下，只有極少數人可以自我實現。「在自由放任的社會中，只有少數富人才可享有自由」^⑥。因此，他們的結論就是，政府為實現「社會公平」，必須採取干涉政策。他們所說的「社會公平」，實在的意義是說，「按照各人所需」將財貨給與不幸的大眾。

如果社會主義的問題，只是言論上爭辯的問題，而未證之於實驗，那麼，缺乏明確的了解與判斷的人迷信社會主義，以為社會主義制度下，自由還可以保存，那還情有可原。但是，自從有了蘇俄的經驗，每個人都知道社會主義國家的實際情形以後，再也不應該自欺欺人去信奉社會主義。

今天，社會主義的信徒們，當他們想使別人相信社會主義無害於自由的時候，他們不得不歪曲事實，並曲解文字的眞意。

已故的拉斯基教授(Professor Laski)——英國工黨的黨員，曾任該黨主席，他自以為是「非共」甚至是「反共」的——曾經講過：「無疑地，一個蘇俄的共產黨員對於自由有充分的感覺；同樣無疑地，他很敏銳地感覺到，在法西斯的意大利是沒有自由的。」^⑦事實上，一個俄國人只有服從命令的自由，如果他的行為與上級的命令稍稍發生一點偏差，他就受到無情的清算。所有那些被清算的政客、官吏、作家、音樂家、科學家們，不僅都不是反共的，而且都是些狂熱的共黨主義者，因為忠於蘇維埃的教條，獲上級提拔，在黨內已有很高的地位。

他們所犯的過錯，只是沒有很快地修改他們的觀念、政策、書籍、或論文，以適應史達林的心血來潮而已。如果我們不把「自由」一詞的意義加以曲解，那麼，我們就很難相信這般人對於自由有充分的感覺。

法西斯的意大利，是一個沒有自由的國家。它抄襲了蘇維埃的花樣，一黨專政，因而對於不同的意見一概加以壓迫。但是，關於一黨專政這一原則的實施，在布爾雪維克與法西斯之間，也有一點顯著的不同，例如，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以前曾任國會議員的共產黨員葛累遮底教授(Professor Antonio Graziadei)，至死是個固執的共產主義者，但他還能生存於意大利，並且以退休教授的名義領受政府所發的年金，同時他也可以自由著述，交由第一流的出版公司出版。拉斯基教授說俄國的共產黨員「無疑地對於自由有充分的感覺」，其實，像葛累遮底在意大利所感覺的不自由，終究不如俄國共產黨員所感覺的那麼厲害。

拉斯基每每喜歡講：自由的實際意義是法律之內的自由。他再進一步地說，法律的目的，在於「保障國家統治者所認為滿意的生活方式」^⑧。如果這句話可以解釋為法律的作用是在維持社會安寧，防止叛徒們煽動內戰以武力推翻政府，那麼，以這句話來描寫自由國家的法律，這是對的。可是，拉斯基又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窮人用激烈的手段來改變富人的財產權，那就馬上會推翻整個的自由制度」^⑨。這句話，他卻講錯了。

我們以拉斯基和他的朋友們所崇拜的大偶像——馬克斯來講吧。在一八四八與一八四九年的時候，馬克斯積極地從事革命組織與革命行動，起先是在普魯士，後來也在德意志的其他各邦活動，從法律上講，他是一個外國人，於是乎被驅出境，帶著妻子兒女和僕人，搬到巴黎，後又轉到倫敦。^⑩嗣後，動亂平靜，革命的煽動者都被大赦，

他獲得允許可以自由地回到德意志的各邦，他也常常回去。此後，他再也不是一個亡命之徒了，他由於自己的意願，選擇倫敦作為住家。

①一八六四年，當他組織國際工人協會(The 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的時候，並沒有受到任何人的干擾。這個協會，照它所公開宣稱的唯一目的，就是在準備世界大革命。當他為這個協會到歐陸各國去活動的時候，並沒有被阻止。他很自由地寫作、發行。而他所寫作發行的書籍和論文，如用拉斯基所說的詞句，那確實是努力於「用激烈的手段來改變富人的財產權。」可是，馬克斯畢竟能夠於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在倫敦梅蘭公園路(Maitland Park Road)十四號的家宅內安安靜靜地死去。

或者就英國的工黨來講，他們努力於「用激烈的手段來改變富人的財產權」，也沒有受到與自由原則不相容的任何行動的阻礙。這是拉斯基知道得很清楚的。

馬克斯，這個造反的人，可以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自由自在地生活、寫作、鼓吹革命，正同維多利亞時代以後的工黨可以自由自在地從事政治活動。可是，蘇俄的政府對於最輕微的反對也不能容忍。這就是自由與奴役的區別。

五、自由與西方文明

自由在法律上與憲法上的觀念，以及為實現自由而設計的制度，常常受人批評。這些批評者所持的理由，有一點是對的。他們說，不受官吏專橫之害，這件事的本身尚不足以構成個人自由。但是，他們為強調這一真理，卻又走到一個錯誤的地步——反對開放政策。

自由主義者從來不以為限制了官吏們的專橫即是個人自由的充足

條件。要使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享有充分自由，必須藉助於市場經濟的運作。憲法與人權清單等等並不能創造自由，個人自由是競爭的經濟制度所賜予，憲法與人權清單等不過使這些自由得有保障，防止行政權力的侵害而已。

在市場經濟下，大家都有機會為他們理想中的前程而努力。分工競業，各有選擇職業的自由。這種自由，在計劃經濟下是不存在的。計劃經濟是由官方決定每個人的職業。每個人社會地位的升降，決定於上級的意旨，個人的前途，完全靠權力者的眷寵。

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每個人都可自由地向他人的既得利益挑戰。如果他覺得，他有能力以價更廉、物更美的產品在市場競爭，他就可以試顯身手。資金缺乏並不妨礙他的企圖，因為資本家經常是在尋找善於利用資金的企業家。工商業活動的成敗興衰，靠的是消費者的選擇；爭取消費者，靠的是價廉物美。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資所得者也不受僱主的任意支配。一個企業家，如果僱不到最合適的員工，或者不能以足夠的工資防止他們轉業，那麼，營業的純利就會減少。僱主與受僱者之間，無所謂恩惠。僱主僱用員工，同購置原料與設備一樣，是營業上必要的手段。員工方面也可自由選擇最適合於自己的工作。

這種決定個人地位與所得的社會淘汰，在市場經濟下不斷地進行。一方面，有些巨富日漸衰落，最後化為烏有；另一方面，有些貧賤出身的人物，地位與財富一天一天顯赫起來。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沒有特權階級；政府對於既得利益，並不給予特殊保護，任憑後起之秀向它們挑戰。在這種社會裏，已經致富的人，為保持財富，仍須努力不懈，與他人競爭。

在分工合作的社會架構裏面，每個人都要靠他自己對於購買者羣所提供的勞務，而他自己也是購買者羣當中的一個人。

每個人，當其購買或不購買的時候，就是一個最高權力的一分子。這一權力，指定了所有的人在社會上的地位。在這所有的人當中，自然也包括每個購買者和不買者在內。

某些人的所得較高，另一些人的所得較低。在這一分配過程中，每個購買者都是影響因素。每個人都可自由提出一種貢獻以換取較高的報酬。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自由，就是：某甲依賴於別人的，並不多於別人之依賴於某甲。除此之外，可以說沒有其他的自由。生產分工，誰也不能完全自給。

我們之所以贊成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主要的理由，還不在於社會主義必然地毀滅一切自由，把所有的人都置於權力者奴役之下。作為經濟制度的社會主義，事實上是不能實現的，因為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市場的功用消失了，任何經濟打算都是不可能的。因此，社會主義不能被看作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它不但破壞了社會合作，而且帶來窮困與混亂。

談到自由問題，不一定涉及存在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相對立的經濟問題。但我們必須指出，西方人之所以不同於亞洲人，完全是由於前者過的是自由生活。中國、日本、印度，以及近東的一些回教國家，在沒有接觸西方的生活方式以前，他們並不是在野蠻狀態下生活。這些民族，在幾百年乃至幾千年以前，已經在工藝、建築、文學、哲學，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有了輝煌的成績。他們也建立過強有力的帝國。但是，他們的努力一旦被阻，他們的文化就陷於麻痺

遲鈍的狀態，失掉了適應新的經濟問題的能力。他們的智力與藝術天才也爲之消失。藝術家與作者，赤裸裸地抄襲前人的格局。神學家、哲學家、法律家，也只以註釋古人的著作爲能事。他們祖先所創造的那些紀念物黯然無光，他們的帝國也已解體。他們的元氣與活力消失了，面對日益貧弱的趨勢而漠然無動於衷。

東方古代的哲學與詩篇，是可以與西方最好的作品比美的。可是在最近幾百年當中，東方人卻沒有任何重要的著作出現。在現代文化史的記錄上，難得找出東方作者的姓名。東方人對於人類文化久已沒有任何貢獻了。有許多問題與爭論，在西方曾經鬧得有聲有色，對於東方人則是陌生的。一方面是波瀾壯闊，一方面是死水一團。

理由是很明顯的。東方缺乏一件最重要的東西——相對於國家而言的自由觀念。東方人從未舉起自由的旗幟，從未強調個人的權利以對抗統治者的權力，從未把專制君主的任意專斷當作問題來討論。因此，他們從未建立一個有效的法制以保障私人財產，防止暴君們隨意沒收。反之，大家總以爲富人之有財富就是窮人所以窮的原因，因而對於統治者之剝削工商界財富，反加讚許。所以大量的資本累積成爲不可能。因此，凡是需要大量投資的一切進步設施，這些國家都做不到。資產階級不發達，著作家、藝術家和發明家也就無所庇托以發展其天才。對於後生輩，所有發展個性的道路都阻塞了；剩下的只有一個，就是服侍統治者這一條路。西方社會是每個獨立的個人可以個別地力爭上游的個人社會；東方社會則是一羣臣民麤聚起來，靠著統治者的恩惠而過活的社會。西方活潑的青年把世界看作一個競技的場所，在這裡裏，他可以贏得盛名、地位、光榮，與財富；在他的野心之下，天下沒有太難的事。至於東方人，因其父母們都是遷就環境、

遵循傳統的，所以他們都養成了優柔謙卑的習性。自立自恃的西方人，那股得意洋洋的朝氣，表現出來，就像熱烈的讚美詩一樣，索福克麗茲(Sophocles)的安提娥尼讚美歌(Antigone-hymn)與貝多芬(Beethoven)的第九交響曲(Ninth Symphony)，就是這種氣概。這一類的音樂，是東方人所未曾有過的。

西方文明的建造者，其子孫將捨棄自由而自願地投降於萬能政府的保護下，這是可能的嗎？由一個最高權力者，設計一具龐大的機器來運用，把人當作這具機器的螺絲釘，這樣的一個社會制度，他們會滿意嗎？停滯了的文明，其心理竟會對於那些犧牲了成千累萬的生命而爭得優勢的觀念，發生掃蕩作用嗎？

塔西佗(Tacitus)提到第庇留(Teiberius)時代羅馬人的時候，很悲傷地說道，他們都被奴役了。

註 釋

- ①從新事物的發明到這種新事物的普遍使用，其時間的距離，可因資本主義的功用而縮短。關於這一點，參看第二章第一節。
- ②參考 *The Church and the Disorder of Society*, New York, 1948, p. 198.
- ③至於利潤一項，則不受影響，因為利潤是來自生產因素的適當調整。僱用中的勞動與物質生產因素，常因供需變動而加以調整。企業家負起這種調整的任務，利潤是這種任務的報酬。利潤隨調整工作的告終而消滅。在理論上，利潤是一時的。但在事實上，由於供需變化不斷地發生，因而，來自調整工作的新利潤也不斷地出現。
- ④孟拉科馬克(Monarchomachs)是十六世紀宗教戰爭時期，一羣不同教派、不同國籍

的作家。他們否認君主有使人民無條件服從的權力。他們有兩個目的，一、保障各別的宗教信仰以對抗宗教迫害，這一點，主要是在保護基督新教。二、他們認為君主的權力不是直接來自上帝，而是經由人民間接獲得的，所以他們是支持人民主權的。這一羣作家的代表者，英國有 Ponet, Goodman；法國有 Hotman, Doneau 等。

⑤參考：Bismarck, *Gedanken und Erinnerungen*, New York, 1898, Vol. II, p. 1.

⑥參考：H. Laski, *Article Liberty in the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X, p. 443.

⑦同上 pp. 445-446.

⑧同上 p. 446.

⑨同上 p. 446.

⑩關於馬克斯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活動情形，參考：Karl Marx, *Chronik Seines Lebens in Einzeldaten*, Published by the Marx-Engels-Lenin-Institut in Moskau, 1934, pp. 43-81.

⑪一八四五年，馬克斯自願地放棄普魯士的公民資格。後來，在六十年代的前幾年，他又想在普魯士從事政治活動，但普魯士的政府拒絕了他恢復公民資格的請求。因此，他與實際政治斷絕關係，這一經過也許就是使他決心定居倫敦的一個原因。

第 5 章

反共與資本主義

宇宙間，一切一切是在變動中。每個事態，都是過渡的事態；每個時代都是過渡的時代。在我們人類生活中，永無固定與休止。生活是過程，不是原狀的維持不變。可是，人們的心智常常被一個不變的幻想迷惑了。所有的烏托邦運動，都明白宣稱，要終止歷史的變動，建立一個最後而永久的安定狀態。

這種運動，在心理上的理由是很明顯的。每一變動都會影響人們的生活環境，使人們必須自我調整以求適應。變動，每每損害既得利益，每每威脅生產與消費的傳統方式。凡是智力遲鈍而憚於修正思想方法的人，莫不以變動為苦惱。因循故習，本不合於人的行為本性，但是，由於那些想保持既得利益的，以及那些心智懶惰的人們傾向於保守主義，所以凡是活潑分子所倡導的改革運動，都會遭受若干阻力。

一般人使用「反動的」這個形容詞的時候，大概只指那些組織保守性政黨的貴族和僧侶們。可是反動精神表現得很顯著的，還有其他的一些事例。例如行會限制新人加入、農民團體要求保護關稅及補助金、工資所得者仇視技術改進，並以工會的力量強迫僱用不必要的工人(featherbedding)等等，都是反動的行為。

妄自尊大的文人和放浪不羈的藝術家，總以為工商界的活動只是

掙錢，並不要甚麼聰明才智。其實，企業家所表現的智力，比平凡的作家和畫家要高得多。那家自命為「文化人」的人，竟不知道成功的企業所需要的才智；這一點，已可表明他們智力的低劣。

這一羣淺薄的「文化人」之出現，是資本主義時代最不受歡迎的事象之一。他們的叫囂，為有識之士所鄙棄。他們對於大眾只有害處沒有益處。如果有甚麼辦法可以抑制他們的喧擾，甚至徹底消滅他們，對於其他任何人不會有何直接的損害。

但是，自由是不可分的。如要限制那般「文化人」的自由，那就要授權政府，讓它去判斷甚麼是好的，甚麼是壞的。這樣一來，文藝工作也就社會主義化了。文藝工作一旦社會主義化，天才就被扼殺。因為權力者不喜歡新的觀念、新的思想方法、新的藝術作風。任何革新都是他們所反對的。所以政府權力一旦涉及文藝部門，其結果，就是把文藝工作者納入組織，文藝界也就成為死水一團。

那般冒牌文化人道德墮落，亂發狂言，似乎是我們人類文化必須支付的一項代價，否則富有創造力的天才就不能有所成就。自由，必須所有的人都可享有，即使是卑鄙的人也不能例外，以免那些能夠利用自由以造福人羣的少數人，受到桎梏而不能發展。拉丁區（Quarter Latin，指巴黎的大學區——譯者附註）那些卑鄙人物們所享有的特殊便利，正是少數偉大著作家、繪畫家、雕刻家得以成就的條件之一。天才所需要的第一件事，是呼吸自由空氣。

而且，那些卑鄙文化人的言論，並不足以為患；為患的，是大家之樂於接受他們的言論。輿論的造型者響應於前，盲從的大眾跟隨於後，這就壞事了。大眾總是趨向時髦言論的；他們覺得，不如此就顯得落伍。

最近六十年來最有害的意理，莫過於喬治·索利爾(George Sorel)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和其直接行動的主張。這個意理，由法國一位失意的知識分子倡導，不久就迷惑了歐洲各國的許多文人。這一風氣，構成了近幾十年一切政治暴動的重要因素。它影響法國的忠君主義、軍國主義、反猶太主義。俄國的布爾雪維克、意大利的法西斯、德國的納粹等革命運動的發展，也以工團主義這一意理為最重要的因素。它改變了政黨的性質：政黨之爭取政權，不靠選民投票，而靠武裝組織。它不信任代議政治與「布爾喬亞的安全」，而鼓吹對內殺伐與對外戰爭。它的主要口號是：暴動、暴動，再暴動！現在的歐洲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有很大的成分是索利爾教條的後果。

知識分子是首先歡迎索利爾觀念的；他們並且把索氏的觀念廣為宣揚。可是，索利爾主義的要旨，很明顯地是反知識的。他反對冷靜的思考與清醒的辨識。他只是要「幹」，要轟轟烈烈地幹。他叫大家為神話而鬥爭。「如果你把神話作為行動的根據，你就可面對任何批評反駁而不為所動。」不要講，不要想，殺、殺、殺！為毀滅而毀滅。這是一個何等荒誕的哲學啊！❶

然而，這種毀滅主義者的荒誕哲學之廣為流佈，其咎既不在索利爾，也不在他的那些門徒——列寧、莫索里尼、與盧森堡(Rosenberg)，更不在那一羣不負責任的文人和藝術家。災難的到來，是因為幾十年以來，幾乎沒有一個人以批評的態度去檢討這個哲學，沒有一個人從心理方面去解析這般暴徒們的毀滅感。

誠然，有若干著作家是絕對不贊同暴行的，但是他們對於獨裁者萬惡的淫威，並不加以嚴厲的譴責，反而要找出一點同情的解釋。後來，知識分子中向來鼓吹暴行政策的人，開始覺察到：即使是極權意

理的狂烈擁護者，也難免慘遭殘殺。直到這個時候，才有人對於極權的暴行，提出微弱的反對之聲。可是，這時已經很遲了。

今天，有一個偽裝的反共陣線存在。這個陣線裏面的人們，事實上是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不過，他們所致力之共產主義，去掉了一些尚不合美國人口味的特點而已。這般人，自稱為「反共的進步分子」，但正確的稱呼，應該是「反反共產主義者」。他們故弄玄虛，把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強行區分。以表示他們所推薦的，是一種「非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不是共產黨宣言那個文件所代表的那一套。他們常常使用「計劃」、「福利國家」這些名詞，作為「社會主義」的別稱。他們以為，這更可以證明，他們的主張不同於共產主義。他們反對共產黨人的革命與獨裁，同時，他們在寫作與講學方面，卻又讚揚共黨革命及無產階級獨裁的導師馬克斯，稱之為偉大的經濟學家、哲學家、社會學家。他們想使我們相信，非極權的全能主義（這等於說，三角的四方形）是醫治百病的特效藥。凡是他們對共產主義提出溫和的反對意見的時候，正是他們要借用馬克斯、列寧的詞句來罵資本主義的時候。他們很明顯地表現出，他們在情感上厭惡資本主義比厭惡共產主義要厲害得多。他們每每把資本主義形容為「不堪言狀的恐怖」，以此來原諒共產黨徒的一切惡行。

這些自稱「反共的進步分子」，他們所反的不是共產主義，而是他們沒有掌握政權的共產制度。他們所力圖實現的，是他們自己或他們親信可以掌握政權的社會主義制度，亦即共產主義制度。說得過分點，他們是想消滅他人。也可以說，他們只是不想被別人消滅。因為在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裏，除了最高的獨裁者和他的幫兇以外，誰也沒有不被消滅的保證。

凡是「反甚麼」運動，只是表示一個消極的態度。消極的運動不會有任何成功的機會。「反甚麼」的運動，如果只「反」而已，那麼，攻擊、咒罵，事實上是替所反的事物做廣告。有所反必須有所為。無論所反的事物是怎樣的壞，我們也不能僅止於反。所以，我們要特別強調：要反共，我們就得毫無保留地要維護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

由於蘇俄搞出來的那一套，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慘痛的失敗經驗，到了今天，共產主義在西方國家成功的機會，應該很少了，如果沒有這般偽裝的反共主義的話。

為防止西歐、美洲、與澳洲的文明國家，被莫斯科野蠻主義所奴役，只有無條件地支持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

註 釋

- ❶ 參考 G. Sorel, *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 3d ed; Paris, 1912, pp.46.49.

附錄：米塞斯的主要著作

這裏列出米塞斯十三本主要著作❶，依其可讀性的難易度分列三組：

第一組 最易讀的

1. *Planned Chaos* (1947). Irvington-on-Hudson, New York: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90 pp.
2. *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1956). South Holland, Illinois: Libertarian Press, 1972 140 pp.
3. *Bureaucracy* (1944). New Rochell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69 128 pp.
4. *Planning for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 and Address* (1952). South Holland, Illinois: Libertarian Press, 1962 192 pp.

第二組 較易讀的

5. *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he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 (1944). New Rochell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69 291 pp.
6. *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 An Exposition of the Ideas of Classical Liberalism* (德文本, 1927). 英譯本 Translated by Ralph Raico. Edited by Arthur Goddard. Prin-

ceton, New Jersey: D. Van Nostrand Co., Inc., 1962 207 pp.

7.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ew Rochell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69 47 pp.

第三組 不易讀的

8. *Socialism: An Economic and Sociological Analysis* (德文本, 1922, 1932; 英譯本 translated by J. Kahane, 1936; new edition enlarged with an Epilogue, Planned Chaos, 1951).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9 599 pp.

9.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1957). New Rochelle, New York: Arlington House, 1969 384 pp.

10. *The Theory of Money and Credit* (德文本, 1912, 1924; 英譯本 translated by H. E. Batson, 1934; enlarged with an essay on "Monetary Reconstruction" 1953). Irvington-Hudson, New York: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1971 493 pp.

11.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 Princeton, New Jersey: D. Van Nostrand Co., Inc., 1962 148 pp.

12.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德文本, 1933). 英譯本 Translated by George Reisman. Princeton, New Jersey: D. Van Nostrand Co., Inc., 1960 239 pp.

13.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1949, 1963). 3rd ed., revised. Chicago: Henry Regnery Co., 1966 907 pp.

註 釋

- ❶ 米塞斯一生的全部著作，已詳載於 Bettina Bien 女士所編的 *The Works of Ludwig von Mises*，由 The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Education Inc., New York 出版。那是一本最完整的書目。其內容不僅包括米塞斯的書籍、論文、書評、書序、演講詞，以及其他雜文，而且還依時間先後，詳列不同的版本（包括各國文字的譯本），最後還有索引。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反資本主義的心境／Ludwig von Mises著；夏道平譯。

--初版。--臺北市：遠流，民80

面； 公分。--(自由主義名著譯叢；3)

譯自：The Anti-capitalistic mentality

參考書目：面

ISBN 957-32-1087-8(平裝)

1. 資本主義

550.184

80000248